

梁鴻志、汪精衛通敵時期詩詞比較論

劉 威 志*

提 要

本文旨借三組「詩詞及其創作情境的關係」間的比較，分析梁鴻志與汪精衛在通敵之際所作詩詞，探尋汪精衛於事敵之際的心聲，同時反思研究者在詮釋汪氏心境時，所可能產生的盲點。

詩詞所以能夠成為解讀汪氏心境的材料，蓋援顏崑陽「中國詩用學」作為認識論根柢；所以援梁鴻志以與汪精衛比較，殆以王明珂「移動觀察」作為方法論基礎。本文以「還都」、「被刺」、「與敵交涉」為三種通敵之際的代表性情境。蓋「還都」象徵彼等正式出任偽府領導人，成為「漢奸」；「被刺」遭受「愛國主義者」的暗殺攻擊；「與敵交涉」，謀求收回受侵之土地與權利，是彼等的自我期許與任務。凡此情境，對「漢奸」而言，都是造就其壓力與期許的自我認同所在。

本文分析這三組情境下梁、汪的詩詞文本，分析每一組詩詞文本與情境之間的關係，並比較這些關係的差異而提出解釋。本文主張，梁氏詩詞的縱橫家謀略，與吾人理解汪政權甚至抗戰的角度相近；然而，汪氏詩詞中，一往無前、

本文於 107.06.26 收稿，107.11.14 審查通過。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1812_(63).0003

自我犧牲、開誠布公的表現，卻是兩國傾軋相爭之際與之後，鮮見的思慮與境界。

關鍵詞：汪精衛、梁鴻志、通敵、偽政權、淪陷區文學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iang Hong-Zhi's and Wang Jing-Wei's Literary Works in their Period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

Liu, Wei-Chih*

Abstract

Drawing three sets of detailed comparis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ems and their contexts,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analyzing the literary works by Liang Hong-Zhi and Wang Jing-Wei in their period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 It thereby explores Wang's inner voice when he served for the enemy and meanwhile reflects on potential blind spots in interpreting his real frame of mind. The epistemological base of this article is Yen Kun-Yang's "chinese poetry useology"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se f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Wang and Liang is Wang Ming-Ke's "mobile observation." 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major situations from the context of collaboration: (1) the returning of the government to Nanjing, (2) the assassination, and (3)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enemy. The first one signifies Wang becoming a traitor leading the pseudo-regime under the Empire of Japan. The second refers to patriotists' attempt to assassinate him. The third indicates Wang's self-expectation and mission to end the war and reclaim the lost lands and rights. These three exerted pressure on Wang and developed his self-identity and self-expecta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Liang's and Wang's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the three contexts and explains the work-context relations in each set of them. The fact diplomatic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stratagems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Liang's works approximates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Wang's regime or even his role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owever, the spirit of courageous advance, self-sacrifice, and candidness embodied in Wang's literary works is an incarnation of noble endeavor rarely seen during the war and in its immediate aftermath.

***Keywords:* Wang Jing-Wei, Liang Hong-Zhi,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 pseudo-regime, enemy-occupied area literature**

梁鴻志、汪精衛通敵時期詩詞比較論*

劉 威 志

一、前 言

汪精衛晚年與敵謀和、自毀一生光榮史的抉擇，總引人質疑，何以年輕之際願為革命犧牲且功成不居的汪精衛，會在日人鐵蹄下屈服？這個問題勾聯出的關懷已不只是孰忠孰奸、是非對錯，而是人的「整全性（integrity）」是否終將在其生命的推移、遭際與淘選下失守？

史家率先為吾人追索答案，或曰汪性格中，賁猛與柔弱，兼而有之；或曰軍勢艱困難守，降亦不失為一策；或人道主義之考量，或和戰策略之運用，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在回答「整全性」是否可能的質疑。換言之，與其找出那些汪精衛為什麼屈服（或暫時屈服）於日本的種種理由，不如說更想知道的是，汪精衛在那個情境之下究竟作何想？汪將何以面對舊友與國人？何以「面對」敵國日本？何以面對自己？「強凌弱」環境裏的「弱者」，真能有其主動性嗎？在此情境裏，人之所為人的選擇、不選擇與被選擇，究竟如何可能？

汪精衛臨終前，曾透過林柏生，自承年來心事都在一部《雙照樓詩詞稿》裏；¹汪榮祖提示，要考知汪精衛心事，當從詩詞下手；²余英時亦主張「汪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不吝針砭，惠賜犀照之見；本文撰寫過程，幸得汪榮祖教授指點迷津，復承謝正光教授以琢以裁。所獲良多，特誌於此，以示不忘。

¹ 引自何孟恆：《雙照樓詩詞稿讀後》（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藏鋼筆手稿本，1999年），頁2。

² 汪榮祖：《詩情史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297。

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³然而，以個人之詩詞探求其心事，卻談何容易？元好問早有「心畫心聲總失真」之嘆，陳寅恪亦發「千秋讀史心難問」之疑，錢鍾書更質疑汪精衛刻意「愁苦求詩好」；總之各種創作論下的操作技巧，與以意逆志的客觀限制，時下研究汪政權的學者，多置彼等詩詞為旁證，甚且存而不論，不為無因。乃知以詩詞考索心事的途徑雖在，但似必先跨越若干預設理論與操作方式間的鴻溝；進一步說，必須建立一種相對客觀、具有反思性的闡釋架構，作為「以詩詞探問心事」的理據。

顏崑陽嘗為「以詩詞探問心事」提供理論基礎。他提倡「詩用」一說（「用詩，是一種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強調詩歌乃呈現文人間以詩為符號而發生的期應、諷化與感通等社會作用，有其獨特的場域與結構。因此，文人間分韻、唱和、題詠、贈別等場合所撰詩詞，可以視作考察社會文化、政治氛圍、文人心態的絕佳素材。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傳統中國詩歌，是以社群交流為目的而作；以「社會文化性效用」的角度去闡釋詩作，足以貼近作者的創作意圖與當下的創作氛圍。顏說鬆動了五四以來橫挪西方「純文學」概念為衡量古代詩歌的單一標準。⁴

顏說更可以引申到其他傳統文類，譬如對聯、序跋，甚至詞、曲在案頭化之後、在進入文人雅集唱和活動中之後，也俱含相同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功能；何況五四之後，白話詩不過嬰兒初生狀態，古典詩根本從未消亡，「中國詩用」的文體與情境，所在多有，除汪精衛外，汪政權裏，龍榆生、趙尊嶽、

³ 余英時：〈雙照樓詩詞稿序〉，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年），頁21。

⁴ 筆者認為，如果說顏崑陽「中國詩用學」提出了一詩用的社會文化框架，那麼其《詩比興系論》所闡明的「比興」則可視為「詩用社會」所以交流、發展、相互作用的動力來源。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氏著：《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247-271。顏崑陽：〈「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顏崑陽：《詩比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頁260-324。

李宣倜、梁鴻志諸家，都是「詩用」的箇中高手。

當然，確認「詩用」的歷史真實，並不代表研究者就能夠重返「歷史現場」。研究者還必須體認自我所處的「讀者位置」，不妄作「閱讀主體代位」，此即顏崑陽所謂「多重讀者」說。他以情境當下、面對作者的讀者為「第一序讀者」，主張作者與「第一序讀者」之間，是由「某一私涉關係所形成的事件語境」。作為脫離事件語境的後來者（包含研究者）而言，都是「第二序讀者」，無論如何透過文本內外緣分析與歷史參證等「相對客觀而嚴格的方法學」企圖重建事件語境，也只能是逼近「原初本意」的「擬真本意」而已。⁵

以詩詞探問汪精衛通敵時期心境的理論框架、限制等認識論基礎已如上述。然而，卻還需要操作上的方法論，即研究者要如何檢證自己對詩詞的詮釋，能夠逼近「擬真本意」的層次，而不是歪離或悖反？除了細緻嚴謹的文本內外緣分析與歷史參證外，「相對客觀而嚴格的方法學」更是每一項人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

同為人文學科之研究，史家王明珂在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觀察歷史文本時，也曾自我質疑：如何知道自己對田調現象與歷史文本的解讀正確無誤，而不是受到自我「歷史心性」的拘牽？不是受到固有文本結構背後意識形態的侷限？⁶ 依此反省，王提出自我驗證之法：

（由於）歷史文本有模式化情節。它們任何單一文本都無法呈現此模式化情節；只有將這些歷史文本放在一起，我們才能見著它們同樣的文本結構。這已表示，我們的觀察，須由一個文本「移動」到另一個文本，才能獲知它們共同的文本結構。⁷

這是王明珂拿來解釋處於藏、漢兩族之間的羌族各部落間，如何以傳說與神話

⁵ 顏崑陽：〈中國古代「詩用」語境中的「多重性讀者」〉，政治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合辦「文學閱讀的觀念與方法：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2017年6月10-11日。

⁶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259。

⁷ 同前註，頁288。

的文本，隱喻外力介入、環境變遷與族群融合（情境）的方法論。他認為，透過比較「此一羌族傳說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與「彼一羌族傳說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可以有效的驗證研究者對於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之推論是否合理；進而避免自己因族群、意識形態、教育、慣習（*habitus*），導致詮釋時的偏頗而不自知。若代入到本文的問題意識裏，汪精衛的詩，即可視作（歷史）文本；這些文本，作於汪與日謀和期間的「情境」中。「文本」與「情境」間，必有一種「對應關係」。傳統詩歌詮釋，就是透過這層對應關係，從而以意逆志。但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機制，驗證所詮釋出的這層對應關係，那麼再嚴謹的「文本內外緣分析與歷史參證」，都有可能無法對「汪詩文本」與「對日謀和情境」的「對應關係」秉燭照幽，徒遺主觀臆測之譏。透過王明珂「移動觀察」的方法，透過從「一個文本與情境的觀察」，移動到「另一個文本與情境的觀察」，藉由兩種以上「文本與情境」的研究，一方面觀察共同的文本結構以進行詮釋，一方面透過比較，排除研究者自身在解讀文本之際的洞見與不見，此即王明珂所謂「移動觀察」：

移動觀察強調的是，我們所見「歷史」只是鏡面上的表相。我們必須從觀察一個文本（鏡面表相）與情境（鏡下物的本相）的對應關係，轉移到觀察另一個文本與情境的對應關係，如此我們才能察覺、認識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之間的關聯，以及文本中各種意符所對應的情境指意，以及個人在其間的認同情感與意圖。⁸

移動觀察強調的是，透過兩組以上的「文本與情境」的對照關係，讓我們考知「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之間的關聯」。由於兩組以上的「文本與情境」的對照關係，使得以傳統箋釋中，以詩詞探問心事的單線操作手法，得到信度的增幅、詮釋效力的肯認與延伸；並容得後來的研究者在同一「文本與情境」的關係裏，持續進行比對與微調，以期無限地逼近詩人之「志」。

⁸ 同前註，頁 288-289。余英時曾在〈雙照樓詩詞稿序〉中，以偽政府成立之際，汪精衛的詞與周佛海的日記對比，即近似於王明珂將一組「文本與情境」和另一組「文本與情境」的關係作對比的方法。只是王更為之理論化、方法學化。

在對照與比較之中，抽絲剝繭，看穿既有的文本結構（文體、文風、格式），指出「文本中各種意符所對應的情境指意」，於是，「個人在其間的認同情感與意圖」遂能因此凸顯。透過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的對應關係、透過兩種以上對應關係的移動觀察，將更有反思性地避免研究者的先入為主（無論企圖翻案、自詡客觀，或者歷史命定論，都是一種先入為主），這是研究汪政權詩詞時，最需要小心翼翼的關竅。

再者，由於各類文本所屬的文體，自有其程式。譬如古典詩詞形式裏的押韻、對仗；或者戲曲中的舞臺表現形式；或者小說的敘事結構，這些既定的文體結構，使得我們在考索「汪詩文本」與「對日謀和情境」的對應關係時，容易受「文體」結構干擾。所以，本文所以持以移動觀察的比較文本，其文體限定在古典詩詞。⁹此即筆者援引梁鴻志通敵時期詩歌，以與汪精衛比較的方法論。

由於汪精衛生平重要事跡多已為人熟知，不必贅述，但梁鴻志生平暨其搶先汪政府兩年與日謀和的事跡，卻罕人聞問，茲略述梁鴻志之生平如下。梁鴻志（1883-1946），字眾異，晚號遇叟、迂園、无畏，福建長樂人，京師大學堂畢業。曾任北洋政府參議、秘書長，又任段祺瑞臨時執政秘書長。國民革命軍入京，梁避居東北數年。九一八後，移居上海。蘆溝變起，在日人白田寬三支持下，於1938年出面主持維新政府，任行政院院長兼交通部部長；汪組府後，改任汪政權監察院院長，意頗怏怏，俱見其詩。¹⁰汪歿，任立法院院長。抗戰勝利，以漢奸罪論死。¹¹

至若以梁鴻志與汪精衛比較，其比較的基礎與意義安在？一者，兩人先（1938-1940）、後（1940-1944）出任東南淪陷地區的通敵政權領導人，兩人

⁹ 至於詩詞之異，正是本文所以用梁鴻志來與汪精衛對比的緣故，詳下述。

¹⁰ 劉威志：《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1938-194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祝平次、王偉勇先生指導，2017年），頁282-284。

¹¹ 在汪政權之前，日人已扶持北平臨時政府、華中維新政府等親日政權，政權之成立與遞變，可參余子道等：《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98-152。梁氏生平，隱沒不彰，筆者曾以《爰居閣詩注》加上其他檔案資料，考索梁氏生平，以文章主軸並篇幅限制之故，未容細論，當另撰文發表。

在政治系統上分屬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其次，就文學風格而言，梁、汪各自代表同光體與南社。¹²《文心》以才、氣、學、習作為劃分文人差異的指標，梁、汪在文學風格、政治派系與個人生命史的差異，當是二人詩詞比較所以能夠產生意義的所在。

透過「汪精衛通敵時期的文本」與「通敵情境」的對應關係，和「梁鴻志通敵時期的文本」與「通敵情境」的對應與比較關係，有目的、有方法、有結構地探問汪精衛通敵之際的心事云何，追尋整全性的可能。本文在三組「政權成立」、「遭受暗殺」與「對日交涉」的通敵情境基礎上，比較梁、汪如何在此情境中撰作詩詞文本，從中考察「文本結構與情境結構之間的關聯」，挖掘其「認同情感與意圖」。

茲分「汶陽田返」、「國人皆曰可殺」與「交鄰國，有道乎」三節，考察梁鴻志與汪精衛，以詩以詞的言說方式及所表現的心境與思考。

二、汶陽田返

同情汪政權的回憶錄提到，汪氏戰前與日周旋暨戰時成立政權之際，痛苦非常，¹³ 諸家所以提出如許說法，殆緣汪若真以奪名爭權為目的而出組政府（或說稍存名利想），此際自當顧盼躊躇為是。爰以梁鴻志與汪精衛在其政府成立之際所作詩詞為參照點，分析華中地區前後兩任通敵政府領導者在「還都」之際的心境。

¹² 汪夢川：〈汪精衛與南社「代表人物」說〉，《江漢論壇》2006年第4期，頁114-116。《光宣詩壇點將錄（甲寅本）》云梁鴻志詩「植骨杜韓，取徑臨川，頗得介甫深婉不迫之趣。入關以後，詩筆健舉，風骨益高。使在黃門，當在陳洪之列。小溫侯追隨宋公明，自是一員大將也」。汪辟疆撰，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98-799。

¹³ 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收於陳公博著，汪瑞炯等編註：《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年），頁405-409。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127-128。

(一) 梁鴻志自比仲尼相魯

1938年3月28日，維新政權成立之際，梁鴻志有〈二月二十七日題金陵行館〉詩。¹⁴當日，維新諸員在今南京總統府宣誓就職後，30日旋返上海新亞酒店（維新政府以此為暫時辦公處）。¹⁵梁詩沒有透露返回上海的訊息，卻對成立政權頗多自我期許。詩云：

齊人初返汶陽田，世難千鈞我一肩。誓撫瘡痍如此水，莫言飢溺盡由天。
隆中葛亮求儒效，江左夷吾愧昔賢。今日題窗身漸老，鍾山筠竹定何年。
昨游靈谷，因憶荊公題窗舊事。

首聯「齊人初返汶陽田」，陳註引《左傳》（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是會孔子為魯相，卻萊夷、斬侏儒，臨大國而不懼，最終促成齊魯之盟，並約得齊國歸還所侵魯舊地汶陽，即所謂「返汶陽田」者，原典作「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梁鴻志選用此典，以齊強魯弱對比中日情勢，並認為維新政府乃靠著盟約等外交手段，與日本交涉，得返所侵「汶陽之田」。這聯用齊魯的國力懸殊、夾谷之會的爾虞我詐比喻對中日關係與交手狀態，實頗適切。出句「齊人初返汶陽田」後，接上「世難千鈞我一肩」，循典故脈絡，隱然以孔子相魯自任。

¹⁴ 《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中題為〈三月二十七日題金陵行館〉，誤，《爰居閣詩註》改「二月二十七日」為是。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編：《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南京：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1939年），頁335。梁鴻志著，陳世鎔注：《爰居閣詩註》（上海：上海圖書館館藏1945年十一卷刊本），卷11，頁1b。錢仲聯〈爰居閣詩註序〉，以清初錢曾之註牧齋詩，擬此時陳世鎔之註梁鴻志爰居閣詩。遵王註牧齋所以有價值，在於錢曾作註之際，與牧齋時相過從，得授作詩意旨。錢仲聯以錢曾註牧齋許陳世鎔，正是因為陳世鎔時任梁鴻志秘書、得相過從之故。陳註約作於1940-1945年，解讀梁詩，陳註是本文不能忽視的進路。

¹⁵ 高丹宇：〈日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始末〉，《東南文化》1999年第2期，頁44-49。

這一聯隱喻結構裏，可以察覺，中日之釁成為宗周概念下的齊魯之爭，而非華夷之辨；再者，《左傳》所深許孔子的，以「軍事同盟」換取「汶陽田返」一舉，是否也屬於某種對敵國的妥協／合作（collaboration）？究竟如何佔得便宜？梁的身分暨其詩之用典，尤堪玩味。

頷聯「誓撫瘡痍如此水，莫言飢溺盡由天」，「瘡痍」，喻遭受災禍後凋敝的景象；「如此水」者，指南京總統府的西園，意與耶律楚材〈和琴士苗蘭韻〉「聖德宛如歌治化，南風猶似撫瘡痍」類似。對句「飢溺」，陳註引《孟子·離婁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莫言」云云，諷刺國民政府自南京撤退，置城內軍民於不顧。本聯承上「世難千鈞我一肩」意，宣誓出山撫瘡痍、拯飢溺的志願。

腹聯「隆中葛亮求儒效，江左夷吾愧昔賢」，字面上言政府新成，禮賢下士，亟求諸儒支持，愧比當年王導，也暗示維新政府人材濟濟，主動爭取效命機會；出句「隆中葛亮」反用劉備三顧茅廬典，犧牲諸葛亮高潔情操與劉備禮賢下士之意，稍顯儉俗。對句「江左夷吾」，陳註引《世說·言語》「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於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導）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歡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西晉末，劉琨據晉陽，與匈奴、鮮卑諸外族抗衡，至晉室東遷後，琨命其外甥長史溫嶠過江，勸進元帝司馬睿，自己苦守晉陽，圖謀恢復。梁鴻志「江左夷吾愧昔賢」之句，字面上自謙雖不能比於東晉王導，而實遙引宰相王導之創制規劃東晉為己楷模。如此選典隸事，亦美臨時政府如西晉劉琨之據太原，抗衡周遭鮮卑匈奴等外族，這當然也某種程度呈現割據的史實，蓋抗日國軍自分多派，而侵華日軍諸部本身亦相互掣肘也。¹⁶ 只是，如稍加苛求梁句中不合今典者，乃日人原以臨時政

¹⁶ 北平臨時政府與南京維新政府，多是由北洋系統的政治人物組成；前者在抗戰前期，已粗具規模與基礎，戰時復經日方華北方面軍一手策畫；日本佔領南京後，華中派遣軍依樣畫葫蘆，也成立維新政權。但日本重北輕南，仍以臨時政府為主。

府為主，而以維新政府附屬，非如梁鴻志自許如王導之領導劉琨也；即如梁鴻志在公開的演講中，亦不得不宣稱「（本政府）原為臨時性質，與臨時政府初無對立之心，向來中央所管事項之不可分析者，仍由臨時政府會商辦理。一俟……恢復交通，即與臨時政府合併」，¹⁷ 梁鴻志此句之選典隸事，雖切古典，卻稍違今情，梁氏的權力意志於不自覺地在選典隸事時洩露。

尾聯「今日題窗身漸老，鍾山筠竹定何年」，所謂「荊公題窗舊事」，典出《冷齋夜話》，¹⁸ 略云王安石拜相之際，作隱居之想；東坡詩中涉死，後人以為不祥，釋惠洪批評此乃俗見。不過，梁鴻志於維新政權成立之日，沉吟於荊公題窗之句，退隱的聲明太明顯，反倒像是要人注意典故中王安石拜相的成就而已。

梁鴻志於政權成立之日，自許仲尼相魯、禹稷拯溺、王導扶晉、荊公拜相，甚至宣稱隆中諸葛孔明紛紛出山相助，詩意雖不乏長者心恤黎民蒼生的惓惓之意，然其使事用典，終難掩顧盼自得之神情。

詩中至少從齊魯之盟、晉室東遷，借用弱國受制於強國壓力，與國家被佔領、遭分裂的傷痛，作為文本隱喻結構的基底。其中，「世難」、「飢溺由天」諸句，可見梁將日本帝國及其中國派遣軍的侵略行為，全數概括為「世難」、為天數，用以模糊化敵人／侵略者的形象。這與將華夷不兩立，收納到齊魯之爭這樣同屬「宗周」認知隱喻的策略相近。

一年之後，值維新政府周年紀念日，梁鴻志作有〈二十七日西園泛舟〉。西園，在南京總統府之內。詩云「渡江擊楫已非時，浮海乘桴是我師。翻就小池來蕩槳，綠波全皺不須吹」，¹⁹ 雖說其時汪精衛已發艷電，呼應近衛聲明，

¹⁷ 或論梁鴻志及其後臺華中派遣軍主張「維新政府」之名，而非「華中臨時政府」之號，即與華北臨時政府與華北方面軍之角力。梁鴻志：〈維新政府成立宣言〉，《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頁3-4。

¹⁸ 北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四部分類叢書集成影印殷禮在斯堂叢書本），卷4，頁3b。

¹⁹ 梁鴻志：《爰居閣詩續》（南京：南京圖書館館藏民國1941年刊本），頁6b。

但日汪尚未深談，梁鴻志亦未必被取代。梁詩既表露「反攻無望」，更萌生去意。對比之下，汪精衛卻沒有這樣的隱退表態。

（二）汪精衛化用後主詞境

1940年3月30日（舊曆庚辰年二月初十日，序屬仲春），汪政權成立；不同於梁鴻志特地於維新政權成立之際作有詩篇，《雙照樓詩詞稿》並無註明作於汪政權成立之日者。就此點，已可略見梁、汪二人面對政權成立時的心境有別。

以《雙照樓詩詞稿》諸作的排順序推敲，最近於成立汪政權成立之後者，應屬〈虞美人〉（空梁曾是營巢處）一闕；²⁰如以文本外部材料佐證，則汪政權中央政治委員趙尊嶽曾有〈虞美人庚辰初夏和雙照樓〉、汪政權行政院印鑄局局長李宣倜有〈虞美人和雙照樓〉，皆步汪韻，由是推知汪是作至遲寫於舊曆四月之前；味三家詞意，俱指還都事，如汪之「空梁曾是營巢處」、趙之「故園消息問如何」、李之「圖書四壁隨兵火，兀坐蕭然我」，²¹皆涉南京；而趙「不教心緒擲江流。會看重開霸業舊皇州」、李「歸來華表獨經過，留得擎天一柱得天多」，則指涉汪政權之成立。

故〈虞美人〉作期，值汪政府接手整頓南北維新、臨時兩政府，同時也正式並公開與日交涉，事務繁雜之際，從中可窺汪精衛還都之初的心境，詞云：

空梁曾是營巢處。零落年時侶。天南地北幾經過。到眼殘山賸水已無多。

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

上片先以「空梁」起興，殆重回南京有所感耳。「天南地北幾經過」兩句，以遷燕形象自喻，流露出南北奔波，目睹焦土殘民、傷心河山的關照與悲懷。較

²⁰ 依趙尊嶽〈虞美人庚辰初夏和雙照樓〉與張江裁《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考得。《雙照樓詩詞稿》，頁309-310。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北京圖書館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拜袁堂叢書》本），頁15a。

²¹ 《雙照樓詩詞稿》，頁83-84。李宣倜：〈虞美人和雙照樓〉，陳道量主編：《國藝月刊》2卷2期（1940年8月），頁34。趙尊嶽：《珍重閣詞》（新加坡：周國燦、周文全、高芝榮自印本，1981年），頁58。

諸前引梁詩、並依汪氏身分地位論，他大可選用鵬雉鴻鵠等喻體，但汪選擇了「遷燕」，隱約使用了第一人稱，將自己放入百姓流離的情境之中，那些迴旋與低翔的姿態，更覺作者與其所關心的山河大地相同境遇、相同心境。²²

下片坐於案牘前、公文堆中，以知上片所言來去經過，是懸念，是追想。「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的「閣筆淒然我」五字，樸拙卻飽含力道。該句本應是「我淒然擱筆」，倒裝之後，成為三個鏡頭的逐次推移：擱筆的動作、淒然的表情，與深夜明燭之下的我。深夜裏最後的點燈者，代表著守護也象徵著努力不懈，更是事務繁多、百廢待舉的委婉言。「夜深案牘明燈火」可見作者雖處殘山剩水，仍不願放棄，挑燈夜戰；「擱筆淒然」，可想見努力之中，又幾番摧折與壓抑。龍榆生曾夜讀汪詞，至「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兩句，「為之泫然、徹夜不能寐」。²³ 此蓋汪精衛於政權成立之初直白的自我寫照，詞情動人。詞末，竟以「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盤空扭轉，一振而起，橫引同志如曾仲鳴、沈次高之犧牲與殉難，自我砥礪、鄭重起誓。

汪氏詩詞的結尾固都能以振起、繼續努力自攝，但都帶有一種自我犧牲的隱喻；對此，錢鍾書嘲以「莫將愁苦求詩好」，未免苛刻。細味詞境，乃自後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變化而出，如「到眼殘山賸水已無多」，

²² 此詞有兩份草稿傳世，其一為殘稿：「憑將倦服更摩挲。芳草最纏綿。只怕殘山剩水已無多。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萬斛滌神州」、其二較完整：「梁泥剝落留蹤跡。歸燕勞尋覓。呢喃不能意云何。似說殘山剩水已無多。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故人熱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加上定稿比對，可知三稿之下片，當是神來之筆，曾未修飾；上片，企圖以殘敗起興，反覆修改，從荒煙漫草（芳草最纏綿）、到尋燕（歸燕勞尋覓），最後定於空巢（空梁曾是營巢處），寫出人去樓空的殘敗感。見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 2017 年秋季拍賣會「汪兆銘《雙照樓詩詞稿》底稿四頁」（<https://auction.arttron.net/paimai-art5119202026/>）。

²³ 龍榆生：〈雙照樓詩詞稿跋〉，汪精衛著，龍榆生校補：《雙照樓詩詞稿》（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藏 1945 年陳璧君獄中手抄呈贈端木愷本，1983 年影印本），無頁碼。

豈非有意於「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後主是不忍看、不願回首，汪精衛是南來北往，孜孜算計，痛知國殘家破，所剩無幾。後主是無力亦放棄挽救，汪精衛則挑燈於案牘，強支殘山賸水護持。汪絕非徒以「愁苦求詩好」。再者，汪的結尾翻起「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那種佯曠的沮喪詞意，振為「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的精神與氣象。李後主那種推向遠景，或以景代替情緒（或收束情緒）、造成餘韻、化解沉重詩境的手法，在中國文人儒道自適的薰染下，並不少見。後來者從而習之，總將人事的衰敗，推向歷史興亡的感慨，已成為慣調。然而，汪精衛本其核心關懷與氣質，變作「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悲壯的詞句，革命黨人的性格、南社的文學主張、汪精衛的心事情韻，每盡顯於類似的收篇。

至於趙尊嶽、李宣侗兩人和作，可見趙詞「綠陰晝翳微涼處。談笑容揮羽」、「清泉石榻溫茶火。夢外思量我」，故作名士曠達之態；李詞「鳳凰池上鳴珂處，簪筆翩翩侶」、「留得擎天一柱得天多」，雖亦涉家國瘡痍之痛，然終不能不致意於政權成立之初的期許與鷹揚。比較之下，可知汪精衛於「還都」之初，心中最先浮現的，是李煜〈虞美人〉裏殘山剩水的痛憾，換言之，汪所想對應的情境是「亡國」。梁鴻志用那些偏安與開國的典故，對應的認知是「建立政權」；然而，汪精衛卻又能在這樣固有的文本結構中、在後主「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那種已難突破之詞境上，完全依憑自己革命黨的生命經驗，拔翅振起。李煜的詞境讓讀者駐停慨歎，汪精衛的詞境鼓舞眾人捨命向前。於此可知汪氏詞心與筆力，亦能體會詞家龍榆生所以為之泫然、中夜不能寐，並隨之奔赴的情感號召力所在。

平心而論，在對日的政見與方向上，汪、梁大致相同。而從兩人的政治目標與所管轄範圍來看，梁只要收拾殘局、維持地方，而汪精衛則有促使全中國、全東亞和平之願。以此來看，汪的格局與企圖甚大，梁似純以不忍之心，出面維持和平，格局與目標較小。²⁴ 然而，梁鴻志於成立政權時所作詩句，表面雖

²⁴ 梁於戰後自辯，所以出面組府，乃受重慶孔祥熙之托照顧淪陷區百姓；孔曾派薛大可到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為梁作證。見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頁668。

是憂國憂民，但考其用典，卻難掩鷹揚意得、雄視四海。反觀汪精衛，則淒然難已、痛苦難當。

且梁無論是起是落，隨時都有退隱之心，或者說表現謙讓之意，此殆傳統文人習氣，容或難免；汪精衛則總是義無反顧、淚盡而繼之以血。如此亢龍而不悔、曾不稍自斂抑的風格，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頗屬異數。

但必須指出，梁鴻志的技法，其實比較正宗，有股自認為改朝換代後、出拯黎民蒼生的氣概，換言之，就是成王敗寇的邏輯思維下，自我標舉並展演氣度胸襟的話語。古往今來得勢、得正統者，都不乏類似的表述。

三、國人皆曰可殺

汪、梁都曾因「親日」，遭激進「愛國人士」或重慶方特務暗殺。汪分別於南京、河內遭遇一次。梁在段祺瑞秘書長任內，被學生運動毀家；復在維新政府行政院長任內，被軍統特務下毒。汪、梁以「和平運動」自詡「救國」，考察兩人因其「救國主張」而遭生命威脅時在詩詞中的表現，不但可知「愛國的叛國者」之心情，²⁵ 也可從創傷後的反應，分判二人性格氣質之別。

（一）不做示疾的維摩詰

陳世鏞《爰居閣詩註》於梁鴻志〈汝曹〉一首下注云「是歲四月十一日，公應日本使館燕集，有人置毒酒中，欲以相害，幸解救得免」，²⁶ 此即「金陵毒酒」事件，報載當時為招待外務次官清水留三郎（1883-1963，日本眾議院

²⁵ 汪榮祖：《詩情史意》，頁 289-297。

²⁶ 見〈汝曹〉題下陳註。梁鴻志：〈汝曹〉，《爰居閣詩註》，卷 11，頁 13b-14a。又金雄白云：「南京一次大宴會中，有人在菜餚中下毒，（維新政府）全部重要人員，幾乎同歸於盡」，亦指此事，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頁 669。

議員)等人,選在日本領事館設宴,²⁷日方與維新政府官員多出席是會。領事館的中國籍僕人詹長麟在酒裏下毒,²⁸與會要員在乾杯後全部中毒,兩名日本書記官當場斃命,²⁹其他人員治療後俱康復。該事件時間點為1939年6月10日,³⁰然而陳世鏞卻注4月11日(即5月29日),未審緣何。日方於事件發生當下封鎖消息,《申報》所得之日期,約晚一至二日。³¹梁鴻志詩云:

²⁷ 維新政府與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此指領事館;大使館者,美稱也。按照當時的日文版《南京旅遊地圖》(南京:南京圖書館藏1939年刊本),日本領事館在維新路(案:國民政府與汪政府時期名「國府路」,即今之長江路)與中山(北)路交界。

²⁸ 下毒者為軍統方特務(復興社)詹長麟。周軍:〈不該遺忘的「金陵毒酒案」〉,《文史精華》2008年第11期,頁53-57。

²⁹ 日本書記官或為「宮下」與「船山」之姓,見「偽維新政府要人梁鴻志、溫宗堯、高冠吾等、為取媚日方、於九日晚假南京日總領事館歡宴。由日來寧之外務省政務次官清水留三郎於七時入席,甫以紹酒乾杯,而出席者即呈中毒狀、行政院長梁鴻志、南京市長高冠吾受毒頗深,聞性命垂危、其中日領事館之青年法官米亞蠟答及弗南亞馬(均譯音,筆者案:みやした與ふねやま)兩人,各據外人方面消息、中毒尤深、於翌日(十日星期六)不救殞命」,見〈南京日總領事館 日法官中毒殞命 廚司兩名毒發後逃亡〉,《申報(上海版)》第23451號第10版(1939年6月14日)。

³⁰ 維新政府概史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概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1940年南京特別市行政院宣傳局排印本),頁538。

³¹ 考1939年6月13日《申報(香港版)》之新聞來源得自上海與重慶之電報,新聞云「X外務省政務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滬赴寧、X駐寧總領館於十日晚七時設宴歡迎、除X方軍政要員一致與宴外、並邀偽組織首要梁逆鴻志、溫逆宗堯、任逆援道、馬逆澄、高逆冠吾等作陪、計共廿餘人、席間X偽觥籌交錯、狀極歡洽、詎料所食黃酒中、為人暗置強烈毒質、X偽暢飲後、立即中毒、均暈倒地上、一時秩序大亂、急召醫士救治、卒以中毒甚深、遂車送醫院、迄未脫離險境、X方對此項消息、于十一日晚始發表、謂酒中毒藥、係抗日份子所置、并已捕獲一人、中毒最重者為梁逆鴻志、高逆冠吾、至X方人員雖傳有高級軍事外交人員在內、但未言姓名」,見〈南京發生大鋤奸案 抗日份子密佈四週 X偽首要多人中毒〉,《申報(香港版)》(1939年6月13日)第460號第3版。但上海版《申報》言晚宴在九日而非十日。〈南京日總領事館 日法官中毒殞命 廚司兩名毒發後逃亡〉,《申報(上海版)》第23451號第10版(1939年6月14日)。無論上海或香港版,皆輾轉從日方封鎖之消息而得,自有延遲。

汝曹以國為孤注，飲堇甘於嚙女脣。世亂公榮姑對酒，途窮叔子轉鳩人。

舊聞噬嗑關休咎，我覺肴觴動鬼神。未腐吾腸仍健啖，維摩休擬病坊身。

這是梁鴻志瀕臨死亡恐懼後所作，然而蘊藏在眾多典故裏的兀傲與詼詼，卻見得梁氏的學問功底與處世態度。究該詩旨趣，乃用自己雖飲毒酒，卻仍精健有力、毫不在乎的形象，嘲諷下毒者不但性格識見卑劣，亦未能傷其毫髮。

第一句「汝曹以國為孤注」，典出《宋史·寇準傳》，乃「和平運動」份子最常用來指斥主戰者的話語。第二句「飲堇甘於嚙女脣」之「飲堇」者，陳註引《爾雅》云「芑堇草，即烏頭也」，烏頭，中藥之屬，性強，味苦，雖有毒而仍可入藥。……《明皇十七事》「上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不死者，乃奇士也』。以汁進，張果飲進二卮，醇然如醉」。第二句最後三字「嚙女脣」者，陳註指出乃漢武帝等柏梁聯句中郭舍人所作「齧妃女唇甘如飴」。據施蟄存〈聯句詩賞析〉云「郭舍人是武帝的管家，東方朔是文學侍從，此二人都以滑稽著名。故以詼諧的詩句結束。郭舍人說：我咬宮女的嘴唇，甜得像飴糖一樣（齧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說：我做不出七言詩，窘得簡直沒有辦法了（迫窘詰屈幾窮哉）」。³² 故知「飲堇甘於嚙女脣」者，梁鴻志自稱飲毒酒仿若與女人接吻，甜蜜回甘。對比首句「汝曹以國為孤注」中「以國為孤注」的忿忿諸人，這裏梁鴻志氣定神閒地飲毒酒，不但甘如飴，甚至甘於「齧女脣」，頗有吃「汝曹」豆腐的意味，袁思亮以梁詩「詼詼」、「兀傲」，洵的評也。³³

頷聯「世亂公榮姑對酒，途窮叔子轉鳩人」，陳註分引《世說》與《晉書》為本聯上下句為注，《世說》「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

³² 施蟄存：〈聯句詩賞析〉，《唐詩百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740-746。

³³ 袁思亮：〈爰居閣詩序〉，梁鴻志：《爰居閣詩》（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1938年刊本），頁1b。

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此梁鴻志自比劉昶（字公榮）也，當日宴會，有維新政府的同事，有扶持維新政權的日本顧問，對梁而言，自屬「是公榮輩」與「勝公榮輩」者，然而連下句「途窮」則知，此處蓋用「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譏嘲下毒者。下句反用陸抗服羊祜饋藥之典故，³⁴以羊祜所饋，竟為毒藥。典故中晉吳對立，羊祜與陸抗雖各為其主，仍不忘以義、以德服人，故知梁句「『轉』鳩人」者，需從持「和平運動」主張的潛語境來看，他們認為，主張抗戰是救國，主張和平也是救國，不過兩方各為其理想奮鬥而已，何至於相互屠戮暗殺。³⁵梁鴻志所謂「途窮」而「轉鳩人」，蓋刺抗戰者因國土淪胥大半，更兼其所主張之策不可行，故只有「鳩人」耳。本聯殆謂自己雖「世亂」而仍有飲鳩之勇氣與雅量，下毒者卻只是走投無路、棄德義以甘鄙行而已。這聯看似詼諧有趣，其實涉及被佔領國在抵抗之際的人道主義危機：是保守退讓，決不傷及無辜？還是玉石俱焚、冒著被戴上「恐怖主義」帽子的風險？

腹聯「舊聞噬嗑關休咎，我覺肴觴動鬼神」，「噬嗑」，《易》「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知「噬嗑」象徵口有物而咀嚼之貌，至於何以「利用獄」？楊萬里云「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³⁶用咀嚼吞嚥食物時必先剷除骨頭魚刺為喻，比喻治獄者能「明辨」（咀嚼中的肉與刺），而將魚刺等物去除。火雷噬嗑之卦，六爻爻辭多以咀嚼食物配上某一刑罰為象徵，用以占卜吉凶，如：六二云

³⁴ 《晉書·羊祜傳》「祜（羊祜，字叔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鳩人者』」。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34，頁1017。

³⁵ 相關論述，參汪精衛：〈舉一個例〉，汪精衛等：《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傳部，1941年），頁7-14。

³⁶ 南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本影印武英殿聚珍版），上經卷6，頁9b-10a。

「噬膚，滅鼻，无咎」、九四云「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云「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咀嚼行為的主體，也正是判案決獄的主體，當然也是占卜吉凶的主體。梁鴻志所以用此句，當切六三爻云「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雖有小錯而無傷。

然而下句「我覺肴觴動鬼神」中陳註所引，則使句義難解。陳註引《北史·徐謩傳》釋「肴觴」，云徐謩因善醫藥，曾有救駕功，故「坐謩於上席，遍陳饌觴於前，命左右宣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不知何義？其謂梁鴻志讚美醫者及時搶救云云？果真作此解，則「肴觴動鬼神」之義也不通。其實，既「休咎」與「鬼神」相對，本聯當與占應吉凶、覬窺禍福相類，梁鴻志殆指：古哲既已訓「噬嗑」之際，當留心所食，以占吉凶；此刻「我」亦能感應眼前饌觴有毒，鬼神為之震盪，將以徵兆示我警我也。言下之意為自己本其積學，早已看穿下毒者的伎倆；而冥冥中鬼神亦有以助我辟易劇毒。

尾聯「未腐吾腸仍健啖，維摩休擬病坊身」，「未腐吾腸」，陳註引枚乘〈七發〉「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梁取其字面義，云毒藥未能傷我，食興依然甚佳。下句「病坊」，陳註引《唐會要》卷49「病坊」條，病坊出自悲田，屬於收留窮困幼老殘疾之人的社會機構。陳註如此，難付梁意云何？筆者以為，此處應出《維摩詰經》「文殊問疾」一段，蓋維摩詰居士深諳諸法實象，又能善演妙義，刻意示疾於人，要趁諸天尊者前來探病之際，出以機鋒，與眾辯難。佛陀知此，特派文殊菩薩前往「問疾」。梁鴻志「維摩休擬病坊身」，蓋刺取其中「裝病」之義，指自己一時倒下，只是權法、方便法而已。當日舉杯諸人無不中毒，幸救治後方免，惟最後死亡者只有二至三人而已。依陳註，梁鴻志自屬被解救後得康復者。可以想見，身為維新政權行政院院長的梁鴻志，面對如此「恐怖攻擊」，自應以泰然自若的無畏精神示眾，此與《史記》劉邦中箭而故作鎮定以示眾人的作法類似，梁鴻志此際定為鼓舞自己（或呼籲同時受鳩諸子）勿再惶惶悽悽、擔心受怕，應假此機會袂衣而起，演說妙義，示從容無懼於天下。

據《爰居閣詩續》編年，梁鴻志此詩寫於被刺後不久，鬼門關前走一回，

豈不驚心動魄？更從傳世文獻看，梁也確實為此斟酌沉吟許久，³⁷然而，詩中卻以各式典故，譏諷下毒者，表示一己的胸襟，化憤怒於無形。「漢奸」身分暫置不論，他這種嘻笑、酸嘲，與佯作之曠懷，與其頻頻站在一統治者規訓人民的角度的角度，都是其詩作特色與個人氣質所在。

維新政權在成立一周年之際，即有《維新政府殉難先烈題名錄》，梁還親自撰寫耒辭，³⁸悼念因「和平運動」遭刺犧牲的同志，不想自己在三個月後，亦遭暗殺。其實，早在1935年12月，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因與日斡旋，遭「愛國人士」暗殺身亡，梁鴻志即作〈挽唐有壬〉，詩云：「憐君母老蹈危機，正義無存盜有辭。早有蛾窺人影過，真成鵬集日斜時。膏蘭微抱天終妒，表餌深心世未知。歲晚滄江向誰語，徹泉哀淚盡交期」，³⁹其哭友、悼同志，則纏綿哀感，不再酸嘲詼詭矣。

³⁷ 徐俊以今傳梁鴻志書畫資料，知梁曾有朱文篆字印一方，是印借山谷句，作「維摩老子五十七」。徐俊認為這方印刻於梁五十七歲之時。由於現今各人名辭典誤繫梁鴻志生於1882年，故徐文主張這是1938年維新政權成立之年所刻。然而，考諸《爰居閣詩註》卷八〈贈李拔可三首〉其三「吾生歲癸未，竊比深寧叟」，陳註云「公生於光緒九年癸未十一月初九日（1883.12.8）」，知梁鴻志實生於1883年十一月，故1939年，也就是中毒之年，正是梁五十七歲之時，也是刻此印之年。黃庭堅〈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有句「菩提坊裏病維摩」、其二有「維摩老子五十七」，梁鴻志用此詩刻印，當與本年的中毒有關。再者，黃詩其三有「禁中夜半定天下，仁風義氣徹修門」，其四有「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皆與其維新政府的性質有呼應。由此可知，「維摩休擬病坊身」的中毒事件半年之後，梁鴻志歲末生日之際，未曾或忘且刻印紀之。徐俊：〈附逆之外的梁鴻志——爰居閣譚屑〉，《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24日）。《爰居閣詩註》，卷8，頁31b-32b。北宋·任淵等注：《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56-357。

³⁸ 《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頁335。相關研究可見劉霆：〈論偽維新政府統治環境的脆弱——基於「維新政府殉難先烈題名錄」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頁80-89。

³⁹ 《爰居閣詩註》，卷8，頁43b-44a。

(二) 以挫折摧傷為指路標

對比於梁鴻志，汪精衛雖從被刺事件起興，全篇卻沒有憤怒之意，似始終與暗殺者無怨無仇。

汪精衛在敵偽時期曾經回思 1935 年被刺情景，作有〈邁陂塘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飯時，家人忽以杯酒相屬。問之，始知為五年前余為賊所斫不死而設也。因賦此詞〉一闕，⁴⁰汪精衛從自己的被刺，想起追隨他致力於「和平運動」或主張「對日親善」諸人如唐有壬、曾仲鳴、沈次高之被刺，百感交集。

汪當年被刺之後，曾作〈二十五年一月病少間，展《雙照樓圖》，因作此詩以示冰如〉。⁴¹汪詩引松、梅、月之德質為喻，與陳璧君相期相許；復以冰霜喻外在嚴峻環境；對於時局、對於刺客，汪謂「冰雪誠摧傷，亦復相磨礱。對此意感激，矯若雙飛虹」；對於未取出脊椎中的彈頭，汪以「百孔千瘡餘，一笑報已豐」，坦然釋懷，不怨不恨，只有「憂在己不力，豈在憂時窮」。

其次，汪精衛重傷瀕死，且終身不癒（此彈卡在脊椎，可想見其痛矣；最終這顆子彈，在汪死前數月才取出，但為時已晚），卻不引為懊恨，汪氏〈印度洋舟中二十五年三月〉寫於將赴德國治療槍傷之際，有句「自被瘡痍常損慮」，可知槍傷確實影響汪之作息與思考，然而這聯下句「轉令魂夢得粗安」，卻見汪自嘲因此傷而獲「小休」。獨就此而論，汪被刺後展現之人格，與對暗殺者之同情理解，已非常人所及。

回到〈邁陂塘〉，葉嘉瑩稱此闕至為悲苦、心意極為堅貞，認為詞中「不僅是由於其內容情意之悲苦為古今詞人之所未曾經歷，更且由於其敘寫之筆法與口吻的質樸真切，純以情意之本質感人，完全沒有絲毫裝點修飾之『作

⁴⁰ 《雙照樓詩詞稿》，頁 314-315。

⁴¹ 據汪夢川考證所謂病者，乃去年十一月一日所受槍傷，此時仍在上海調養之謂。同前註，頁 250-252。

意』。」葉先生因有該詞乃為其妻陳璧君所作一說。⁴² 遭刺五年之後，汪精衛的同志與朋友因主張親日或參與「和平運動」而身亡者，又增有唐有壬、曾仲鳴、沈次高諸人，陳璧君杯酒屬汪同時，牽連出汪氏五年來的感慨，遂又一次向其妻明志、相互砥礪：

嘆等閒、春秋換了，鏡前雙鬢非故。艱難留得餘生在，纔識餘生更苦。
休重溯。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酒闌爾汝。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
家國竟何補。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脩脩猶騰毛羽。誓窮心力迴
天地，未覺道途修阻。君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
聽殘葉枝頭，霜風獨戰，猶似喚邪許。

此詞情境，與五年前贈妻詩相似，都以陳璧君為預設讀者。「嘆等閒、春秋換了，鏡前雙鬢非故」，從時間流逝處破題，蓋自 1935 年被刺至今，已五年矣，此五年間，汪氏因傷去職，接著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轉為對日抗戰，後北平、南京、武漢、甚至革命根據地廣東相繼失守，汪自己從重慶至河內、上海，另立政權，五年來局勢不但變化甚鉅，且一面倒向汪遭刺前所極力避免的對日全面作戰的方向。許育銘指出「（戰前）汪兆銘的對日外交雖然曾被認為是國家的屈辱」，但「確實為中國爭取到四年的寶貴時間」，⁴³ 故知汪詞「等閒春秋換了」之歎，乍以為「歎時憂逝」等平常不過的起興手法，字面後卻背負著苦心經營已久的理念挫敗、國土淪胥、承受惡名的龐大陰影：春秋換了，豈止「鏡前雙鬢非故」而已。

承「鏡前雙鬢」之自己而說「艱難留得餘生在，纔識餘生更苦」，後死之憂，責任更重。從汪早年「釜薪之論」來看，他以為薪燃已以犧牲、為釜則受熱而煎熬，革命黨人各適其性而自行選擇。今日他受刺而未死，不得不選擇受

⁴² 葉嘉瑩：〈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印刻文學生活》第 9 卷第 2 期（2012 年 10 月），頁 119。

⁴³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 至 1936 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1999 年），頁 395。

罨煎熬。

「休重溯。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切上詞序「家人忽以杯酒相屬」，慶祝五年前被斫未死原意。能夠不以「刻骨傷痕」為最傷心者，一是緣於時光更易而局勢日蹙；二是後死之人，當以鍋釜自任。不過，「刻骨傷痕」既「未是傷心處」，其傷心就在「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家國竟何補」，葉嘉瑩認為，汪「家國竟何補」之憾，蓋因《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不遂初衷之故。此處用長吁、默坐，概括憂國之忱。

上片依起首「歎」字，蓄積、迴沓那些憤悶苦抑的情緒，然而，下片卻能跳脫、衝破這一層沉痛與無能為力的氛圍，云「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翮翮猶賸毛羽」，拉回主題，以為縱再被刺又有何懼。汪筆名精衛，此處鴻鵬，自喻也。緊接著「誓窮心力迴天地，未覺道途修阻」，不但不懼金丸，且不畏遠途，以有「迴天地」之目標在前耳。「君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寫下為何客觀上應害怕而我無所懼之原因，那是眾多同志已然為此理想犧牲，言下之意乃自詁「我豈能負諸同志」。故說「中庭踽踽。聽殘葉枝頭，霜風獨戰，猶似喚邪許」，那些同志雖死、精神幻化作殘葉，讓自己在天荊地棘，孤獨一身中，耳邊內心，殉難同志的加油期許之聲，從不間斷。以同志之死自我砥礪，使人感受革命黨人前仆後繼的執著與熱情。本來，詞中上下片之情緒氛圍有推進、有變化，不過基本技法而已，但汪精衛的跳脫與衝破，不是傳統文人的避世隱居、越名任心、或者英雄式的使酒逞氣。汪夢川以為汪氏乃南社代表人物，殆最能解釋汪詩詞中每於腹尾兩聯或下片中的革命式志意。⁴⁴

綜言之，「身體漸壞」與「國勢日蹙」是這闕詞中兩條互為競取的脈絡；汪精衛不但總持身體傷痛與國勢陵夷對比，更總在身體與國勢的對比中，表現出對國勢的更關心、更在乎；並讓受傷的身體，為此關心與在乎，繼續無條件的奉獻、服務，甚至犧牲。

梁鴻志與汪精衛，皆因主和而被刺。面對「國人皆曰可殺」的不諒解與毒

⁴⁴ 汪夢川：〈汪精衛與南社「代表人物」說〉，頁 114-116。

手，梁鴻志譏諷「抗戰」主張為「孤注」；嘲諷之餘，又對行刺者有所規訓，儼然上位者「教化」民人的態勢；從梁鴻志詼諧酸嘲的詩語下，可感受到字字句句，皆與彼等針鋒相對。

汪詞則有一股深憂國是的凝重感。那些摧折他信念的刀創槍傷或每種阻撓，都更像是漫長道途間的指路標，且攙且扶，送他向前邁進。換言之，被刺事件、行刺者，甚至是自己的「刻骨傷痕」，在汪詞中，都不過是促使自己更進一步砥礪為國的臺階而已。汪詞將行刺者概念化、普遍化，成為無生命的金丸、自然界的霜風，彷彿被刺一事，只屬於不可避免、無所仇讎的自然力量。

在一、二兩節中，都以梁詩對比汪詞，詩詞相比，意義云何？《人間詞話》謂「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開國／被刺之際，汪選擇詞體，而梁選擇詩體來表現其心境，從文體特性而論，梁面對自己當下作為與身分，有堂堂正正、直抒其意的意向，面對「主戰」派，梁鴻志「示疾以說法」，教化民人；意閒神定，指畫江山，故謂「境闊」；汪詞委婉悱惻，一步固一挫，卻挫而再起，賭命前行，表現出詞情中「癡纏」的一面，允當「言長」。依憑詞體的優勢與限制，汪所不能盡言者，是開國／被刺的事實；汪所能言者，是事實之下的隱衷、抑鬱、擔荷與自我砥礪。故謂梁、汪在開國／被刺之際，選擇了詩體或詞體，已可視為二人潛在意欲的顯影。

四、交鄰國，有道乎？

在「還都」與「被刺」這兩種情境中，理當在場的「日本」，都在詩詞文本裏缺席。然而，汪精衛與梁鴻志既在日人同意與幫助下成立政權，豈能不與舉國的共同敵人／盟友——日本，作談判協商、止戰謀和的工作？面對侵略者，同時也是幫助自己成立政權的日本人，汪精衛、梁鴻志如何與之交涉、交往呢？本文最後一節，擬從梁、汪兩氏的詩作文本，考察彼等在「面對日本」、

「與日人交涉」此一情境中的表現方式。⁴⁵

(一) 荊凡共存

1938年11月15日至25日，梁鴻志應日本政府邀請，到東京、大阪、神戶訪問。抵日「第二日應近衛首相之招待宴」，之後「各省大臣、宮內省大臣、議會各代儀士、樞密院等，均經會見」，並與「海相陸相及藏相等，每人均經約1小時之談話」。⁴⁶ 本次會議，維新政府計有行政院長梁鴻志、印鑄局局長李宣倜、內政部次長張乘輝、行政院秘書黃溥、財政部秘書黃遠、外務書記官清水董三、陸軍特務部囑託岡田尚，並隨從兩名。⁴⁷

據日本樞密院文書檔案，1938年11月20日，日本時間晚上六點，⁴⁸ 梁鴻志在東京，與日本詩人木下華亭、辻香塢、仁賀保香城、牧野鐵笛、三浦英蘭、竹內清齋、三好凌石、高橋雲厓、前川研堂、春日井柳堂、笠原錦雲、小島石外、守屋碧江、荻原錦、江尾中鶴州、藤本麟角等人於日本東京星岡茶寮聚會，期間迭有唱和。⁴⁹ 從梁與日方詩人的賦詩言志中，可窺雙方對「中日關係」的意見、企圖與立場，如與會詩人春日井柳堂之句「詩於話志非無用，聽

⁴⁵ 近來學界對東亞交涉產生極大興趣，特別聚焦在明清時候，中、日、韓、琉球諸國的使節詩歌與相關文本。從使節詩與文化的視角來看，梁、汪的對日詩作，當可視作漢詩在東亞交涉裏，距離我們最近，同時也最緊張、最令漢文化尷尬的一次交鋒，重要性不言而喻。

⁴⁶ 梁鴻志：〈訪日感想〉（1938年11月28日），《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頁229-230。

⁴⁷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於本院平沼議長ト会見セラレタリ・梁院長一行人名表並日本滞在〉（昭和13年11月17日），《樞密院文書・宮內省往復・稟議・雜書・昭和十三年》，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A06050801600。

⁴⁸ 同前註，頁9。

⁴⁹ 陳註云：「星岡，在日本東京麴町。是日日本詩家木下華亭、辻香塢、仁賀保香城、牧野鐵笛、三浦英蘭、竹內清齋、三好凌石、高橋雲厓、前川研堂、春日井柳堂、笠原錦雲、小島石外、守屋碧江、荻原錦、江尾中鶴州、藤本麟角等，咸與斯集，各有詩。茲錄其步韻者。」高橋雲厓云：「修好遠來共灑尊，善鄰之誼自溫溫。想

到研經感善言」可證。當時，梁鴻志先作〈日本詩家觴我於星岡茶寮惠詩即席賦答〉一首，⁵⁰中、日詩家遂就此詩步韻。梁詩云：

星陵秋色在清尊，主客圖成一室溫。世事弈棋身漸老，我懷石闕口難言。
懸知秦晉終修好，須信荊凡貴並存。要試吾儕作詩手，與君同洗劫灰痕。

首聯點出時地人物：「秋色」，時為 1938 年（昭和 13 年，民國 27 年）11 月中下旬。梁於本年 3 月 28 日成立維新政府，10 月初，才從上海新亞酒店的臨時辦公處遷入南京總統府。所以赴日，乃為梁氏折衝樽俎的外交之旅。「星陵」，陳註云「即（日本東京麴町之）星岡」；「清尊」，清罇，酒器，亦借指清酒；「主客圖成」，用中唐人陳為所編《詩人主客圖》為典，⁵¹切此詩酒文會。頷聯「世事弈棋身漸老，我懷石闕口難言」，「世事弈棋」，出老杜「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以觀弈喻觀世，明清以來詩家老調。這聯的重點在對句能呼應出句典故中因「身漸老」的「百年世事不勝『悲』」。「我懷石闕口難言」，陳註引《古樂府·讀曲歌》「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石闕即碑，多立于宮廟陵墓之前，作銘記官爵、功績或裝飾用。所謂

應翦燭罄懷抱，不得連牀聞讜言。恢拓治民神算在，指揮救國偉功存。知公感慨憂時筆，中有淋漓血淚痕」。前川研堂云：「秋晚星陵共綠尊，風神秀異氣溫溫。怕他勞譚難殫臆，率爾看顏欲忘言。兩國車書交本厚，千年文物道猶存。雲行雨施維新政，洗盡中州水火痕」、「九州儒學賴君尊，勿厭遑遑席未溫。醫國須先芟病槩，救民何用恤人言。山川萬里煙塵暗，禮樂千秋道義存。聞說江南佳麗地，春風蘇綠滿燒痕」。春日井柳堂云：「同種同文斯益尊，交情靄靄釀春溫。詩于話志非無用，聽到研經感善言。古鼎煎茶松籟起，幽庭經雨棟花存。山窗細閱梁公句，剡楮琳琅輝墨痕」。守屋碧江云：「何日舉杯同一尊，忡忡君子德溫溫。誰知奠鼎有神策，敢欲披襟獻鄙言。古道審倫名世出，先賢遺教典型存。滂沱厚惠蒼靈雨，當洗九州鮮血痕」。陳註共錄與會日本詩家十六名。《爰居閣詩註》，卷 11，頁 4a-4b。

⁵⁰ 同前註，頁 4a-5a。

⁵¹ 李調元序唐人陳為的《詩人主客圖》，謂「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餘有升堂、入室、及門之殊，皆所為客也」，所編列皆中唐詩人。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0。

「銜碑不得語」者，先因「石闕生口中」，無法說話；又因「銜碑」與「銜悲」音同，表示銜碑的主體含垢忍辱，苦無可訴。梁這聯自寫年來關注世局，耗力甚鉅，而又因許多因素，未能暢所欲言。然而，日本海軍對於梁鴻志迴還反覆、語帶保留的說話方式，頗不滿意，日軍野村中將曾對汪精衛云「現在在所謂戰區內，日本人正在進行的未必都是正當的。今後如果發現有礙政治工作進展的事情時，希望坦率的向日本方面提出，排除這些不利因素。像維新政府的態度，說話吞吞吐吐，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這絕不是為了日華利益……」。⁵²或許在日人來說，希望汪、梁坦率，而在梁鴻志來說，正是因為不甘為傀儡，又不得不假用外交辭令為最後的抵禦與盾牌吧。

腹聯「懸知秦晉終修好，須信荊凡貴並存」，指中日兩國唇齒相依，雖釁戰而終必歸於和。出句「秦晉之好」乃春秋時秦晉兩國世為婚姻，國盟穩固，此常見典故，但陳世鐸在出句「懸知秦晉終修好」，頗突兀的引用《左傳》「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陳何以引用這句來說明秦晉之好？解答或在對句「荊凡」之中。

「荊凡」，典出《莊子·田子方》：「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這段話自為莊子之詭辯，用破世人存亡執念，故後人多以「荊凡」比喻存亡無定，都用《莊子》本義。⁵³但是，梁鴻志捨棄〈田子方〉本來喻旨不用，轉用其喻體為寄託，

⁵² 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53。

⁵³ 如蘇軾〈王中甫哀辭〉：「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鄭孝胥〈十一月十八夜丙辰（1916）作〉：「苦寒知月味，銜恨斂霜魂。衾影曾何愧，荊凡定孰存」、冒效魯〈除夕和映庵年丈韻 1927年作〉：「中邊猶集苦，乞佛不得蜜。當前聊一歡，荊凡孰得失」。依序見北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冊4，頁1282；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冊上，頁275；冒效魯：《叔子詩稿》（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2-3。

儼然以自己（與中國）為「亡者三」的凡國之君，而以日本人為「不足以存存」的楚君也，其中所自信的「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將立場跳脫出傀儡政權領導人的束縛，而其警示「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在氣勢上壓過對方。⁵⁴「須信荊凡貴並存」云者，其「信」字，蓋同時呼籲中日雙方。雖說梁此句為狡辯，但仍不失為一種外交辭令上的搶白吧。得此，陳世鎔「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之註，想應其來有自。

尾聯「要試吾儕作詩手，與君同洗劫灰痕」，「劫灰」乃釋氏所謂「世界終盡，劫火洞燒」之灰也，梁鴻志言劫灰而不言戰火，將人禍轉向輪迴，以佛教話語的象徵意涵，作為相爭兩國在言和之際的中性陳詞。

面對梁鴻志「口銜石闕」的自許與悲懷、「荊凡並存」的呼籲與暗刺，當時日本詩家，亦各言志，陳世鎔《爰居閣詩注》所錄詩作，頗見日人理解並慰問梁氏之委屈，譬如高橋雲厓之「修好遠來共艷尊，善鄰之誼自溫溫。想應翦燭罄懷抱，不得連牀聞讜言。恢拓治民神算在，指揮救國偉功存。知公感慨憂時筆，中有淋漓血淚痕」，針對梁「我懷石闕口難言」安慰也。又前川研堂云「九州儒學賴君尊，勿厭遑遑席未溫。醫國須先芟病癘，救民何用恤人言。山川萬里煙塵暗，禮樂千秋道義存。聞說江南佳麗地，春風蘇綠滿燒痕」，⁵⁵非但為「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釋懷也，並深許梁出主和平的承擔與勇氣。

但是，若只看《爰居閣詩注》這一文本所形塑的氛圍，則梁、日雙方針鋒對壘之緊張關係，遂被隱沒。當日聚會中，日本漢詩詩壇祭酒，高齡八十餘的國分高胤（こくぶ たかね，青厓，1857-1944），對梁鴻志「荊凡並存」的呼籲與暗諷，有所反擊。《爰居閣詩注》所錄國分之詩，只一首而已，且是最平

⁵⁴ 梁鴻志有詩〈佳日〉（寫於1939年10月左右）云：「拋卻文書即酒杯，駸駸佳日去難回。身疑春繭重重縛，心似勞薪寸寸灰。階下弓刀類兒戲，眼中幢節幾人才。鞭笞六國尋常事，只惜秦人不自哀」，其中末句亦同此意。梁鴻志：《爰居閣詩續》，頁8b-9a。

⁵⁵ 二首俱見《爰居閣詩注》，卷11，頁4a-b。

和的一首。⁵⁶ 考臺灣《風月報》主編謝汝銓（雪漁，1871-1953），錄有當日國分所作詩六首，力道畢見，氣度恢弘，分毫不讓。其〈次韻眾異先生〉二首云：⁵⁷

星陵楓菊照金尊，時屬清秋盟可溫。不有先憂無後樂，久知一行勝千言。
範模山水高懷在，整頓乾坤素志存。他日洗兵還對月，青天雲翳不留痕。

披瀝心肝酒幾尊，肯將芳臭說桓溫。出師依義勞三戰，興國唯仁重一言。
萬里江南梅欲綻，九重闕下菊長存。主賓縱興星陵宴，煙斂東林月露痕。

第一首開篇切文會酒盟，並以「先憂後樂」勉勵梁鴻志，又用「一行勝千言」說服梁不必苦向國人爭辯。⁵⁸ 最後「青天雲翳不留痕」，以雲破月來之喻，寬慰梁之苦心孤詣，最後一定能被看見。「整頓乾坤」、「他日洗兵」的說法，全詩幾乎是預設日本終將勝利而為言。是時也，日軍在中國戰場勢若破竹，故有斯語。

第二首領聯「出師依義勞三戰」，字面承上一句，切桓溫三次北伐；實際表彰日本之進軍中原，與桓溫之翦除北方夷虜，皆「依義」而行。國分高胤自言，於東晉最喜桓溫與陶淵明，⁵⁹ 蓋前者有殺伐決斷、下剋上的競取氣勢，後者有退隱獨居的高潔志趣，與日本軍人當時求戰功、求一死、求托諸禪的意向

⁵⁶ 梁鴻志〈即席呈青厓詩老〉：「詩壇老祭酒，隔海姓名尊。照坐須眉古，迎人笑語溫。神完中有恃，目擊道終存。何日攜行卷，從君子細論」，對於年輩高於己的詩人國分高胤，梁甚謙虛，國分回贈〈星岡茶寮席上呈眾異先生詩〉云：「中外方多事，琴尊喜見君。一心無異域，兩國本同文。憂世忘身老，論詩坐夜分。相攜欲游晃，楓錦已繽紛」。同前註，頁 4b-5a。

⁵⁷ 謝汝銓編：《風月報·詩壇》85、86 期合刊（1939 年 5 月號下卷），風月俱樂部編：《風月報》（臺北：南天書局，2001 年），頁 20。

⁵⁸ 《法苑珠林》有「聞行得度，雖誦千言，不敬何益，不如一行。欣樂奉修，雖誦千言，我心不減，不如一句」。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48，雜誡部第六，頁 1461。

⁵⁹ 國分高胤〈次韻答（梁鴻志）見贈〉有句：「唐賢欽李杜，晉業愛陶溫」。謝汝銓編：《風月報·詩壇》85、86 期合刊（1939 年 5 月號下卷），頁 20。

頗合。⁶⁰前一句「肯將芳臭說桓溫」，刺取典故中「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那種大丈夫逐鹿中原的豪情壯志，⁶¹這句用來自指日軍當然無所不可，日軍本就是問鼎中原，欲以自加九錫，且並不以「剋上」為恥者；但是，如果這句挪來指梁鴻志等人，則充滿諷刺，像是嘲笑梁鴻志已經做了如晉景帝與文帝之篡奪行為，卻臨事而躊躇，不能堅持到底，意欲半途而廢。真可謂對「懷石闕」、「口難言」的梁鴻志一記「棒喝」。《爰居閣詩注》不錄此首，良有以也。

「出師依義勞三戰」的對句「興國唯仁重一言」，亦寬慰梁詩「口難言」。但其遣詞措字的氣度與位階，較諸其他日本詩家，更帶有上位者的目光。國分化用《論語》「一言而可以興邦」與「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⁶²以梁之出主和平，一本於仁心，既以仁治國，自有好人惡人的道德與政治位階，何用委屈；又表示梁鴻志如能從「懷石闕」體悟「為君難」的道理，則可以「興邦」矣。

腹聯「江南梅欲綻」隱喻維新政府主持東南之局，將有成果；「闕下菊長存」譽美主政者梁鴻志自能高潔。尾聯將此次聚會，喻為慧遠蓮社之盟，呼應「菊長存」中的陶潛典故。梁詩則只將聚會比諸《詩人主客圖》，國分高胤則比諸東晉東林寺之蓮社；梁兩用《莊子》典故，國分則逕以《論語》回應；就

⁶⁰ (日) 戶部良一著，韋平和等譯：《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257-324。

⁶¹ 《世說·尤悔》云：「桓公臥語『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案：晉文帝司馬昭、晉景帝司馬師）。』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813。

⁶² 《論語·子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曹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語疏卷13，頁6a-b；語疏卷4，頁1b。

詩論詩，國分更為義正詞嚴之餘，又因爰比經書而帶有正統性與霸氣。國分高胤帶著當年日人的霸道，其以陶、溫比肩的史學識見與文學品味，放在中國傳統思想脈絡中頗感突兀。這或許是武士道與儒、與禪合流之後的特色，其言志意向，殊堪玩味。

或曰兩人從年輩上看，梁不到六十歲，國分則已是八秩高齡。梁不與較勁，尚不足以逕下「示弱」之判語。只是，國分高胤另有詩贈席上李宣倜，還是隱約透露當日的緊張氛圍，其〈次韻釋戡先生〉云「嘉賓在座賞秋光，興逸休尤醉發狂。倚檻欲迎松月皎，掀簾快受竹風涼。雲蒸龍變多依勢，水到渠成自有方。劫後經綸能秉正，不惟詩戰陣堂堂」，其中「興逸休尤醉發狂」是國分自覺前引桓溫「芳臭」之典不適當？「劫後經綸能秉正，不惟詩戰陣堂堂」彷彿用一種總結與規訓的語氣，收束所有唱和。經上述之分析，殆可想見梁、日當時以詩唱和、對壘，頗多緊張。⁶³

梁鴻志一行人赴日前兩周，詞人趙尊嶽曾與梁晤談於總統府。⁶⁴ 趙尊嶽〈戊寅九日（1938年10月31日）客南京爰居署齋〉有句「車書王會千秋盛，饒吹戎師萬馬瘖。為問故園花事好，疏籬澹菊費沉吟」，⁶⁵ 致意於梁鴻志將以「車書王會」而止戰洗兵，同時也以「故園花事」、「疏籬澹菊」等滋蘭樹蕙的隱喻暗示人才培養、養生息民。梁鴻志和作〈叔雍自上海來下榻署齋重陽前一日有詩次和〉云：「與君江國共秋陰，直以樓居當入林。傷亂頓忘佳節近，忍寒寧畏朔風侵。雄談破夜吾猶健，野哭經年眾已瘖。隻手待援天下溺，吏休

⁶³ 之後國分又投詩梁鴻志，仍用同韻，卻已無日方霸道的用語或選典矣。見國分高胤〈柬眾異〉：「鄰邦髦俊喜俱尊，風格瑩然玉與溫。河嶽一清欽大業，乾坤再造豈空言。舊聞出水周蓮淨，應有傲霜陶菊存。夢寐中原臥遊久，幾時玉賦雪泥痕」。謝汝銓編：《風月報·詩壇》85、86期合刊（1939年5月號下卷），頁20。

⁶⁴ 趙除了況周頤詞學弟子的身分之外，同時也是戰前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並在隔年（1939），擔任汪精衛的信使，與臨時、維新暨吳佩孚，討論汪政權成立之後的南北人事整合問題。

⁶⁵ 此題《高梧軒詩》十三卷刊本刪減作〈九日客金陵〉。趙尊嶽：《高梧軒詩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高梧軒詩全集十三卷刊本），卷3，頁47。趙尊嶽：《高梧軒詩》（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鋼筆手稿九卷本），卷3。

賓退一沉吟」，⁶⁶詩中盡是自許自期之意，未涉「秦晉修好、荊凡並存」諸句，從知梁在日酬詩如此，特向日人進言也。⁶⁷

(二) 「雙照」的本事與體用

對比於梁鴻志與日唱酬，汪精衛在 1942 年秋末冬初，受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囑託，題有〈重光大使屬題三潭印月圖卷〉。重光葵（しげみつ まもる，1887-1957），日本近代外交家，自一戰後，活躍於中日韓俄等國際外交場合四十年，主導並參與日本主要的對外方針。1932 年，重光葵於一二八事變（淞滬會戰）後，代表日方與國民政府談判。與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交手。當時汪氏與重光各自壓抑國內與軍部的主戰聲浪，力持中日親善和平的立場，故雖然重光葵在簽約前被朝鮮抗日志士炸殘右腿（1932 年 4 月 29 日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仍抱傷出席並完成《淞滬停戰協議》的簽訂儀式。汪政權成立後第三年（1942 年 1 月）起，也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方改派親中派重光葵出任駐華大使，令汪方相當興奮。⁶⁸

汪精衛〈重光大使屬題三潭印月圖卷〉詩，正作於重光葵任汪政權大使任內。詳考該詩作期，當在 1942 年 9 月 24 日之後與 12 月 19 日之前，⁶⁹在這三個月期間內，汪精衛曾於 9 月 25 日「上午，偕褚民誼，赴迎賓館與日本特使平沼、有田、永井懇談，再三表示國民政府參戰之要求。平沼答以此事御前會議未決定」，⁷⁰知汪等致力於參戰，不但想假藉參戰國的地位，與日商談「全面和平」；10 月 26 日，汪謁香山孫中山衣冠塚及段祺瑞之墓，似乎有意模仿

⁶⁶ 《爰居閣詩續》誤將此詩排於贈日人詩之前。《爰居閣詩續》，頁 3a。

⁶⁷ 或梁鴻志向日人吐漏甚多偽政權領導人的苦水，或者日人甚為同情梁出面主持大局也。譬如重光葵在其回憶錄、室伏高信在其與汪對談中，多對中方出面組府之人表示此意。

⁶⁸ 重光葵在 918 事變後既主對中親善、廢除不平等條約，在日政府中（尤其是軍部），亦承受不少壓力，汪引為知己同調，亦在情理。

⁶⁹ 在〈壬午中秋（1942.9.24）夜作〉之後與〈飛機中作時為十二月二十日，月將望，故云然〉之前。《雙照樓詩詞稿》，頁 327-329。

⁷⁰ 蔡德金、王升編：《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年），頁 344。

段祺瑞主導中國參加一戰，而得到以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企圖；12月4日，重光葵告知汪精衛，日本政府希望汪等赴日商討國府對英美宣戰事宜；經過汪府內部核心諸人數日的討論後，汪等於12月20日至東京商討宣戰事宜，得日相東條英機口頭承諾「日本絕不乘中國參戰，對國府加以束縛，反將盡速取消租界及領事裁判權；對於處理英美敵產，將以好意與我洽商」。⁷¹在汪等盤算裏，日本為了讓軍力集中於對英美的東南亞殖民地作戰，日本不得不從中國撤出部分兵力，將「治安維持」的工作交付汪政權；同時，參戰意味著汪政權與日德義同盟，日本必將釋放更多獨立自主之權力予汪政權。這些都是汪精衛諸人於太平洋戰爭開戰初期的樂觀面思考，如重光葵的戰後回憶錄，亦主類似觀點。⁷²這首〈重光大使屬題三潭印月圖卷〉就作於汪政權積極向日本訴求參戰的期間。

筆者未見汪所題《三潭印月圖》，忖此圖可能是日本駐華大使館參贊清水董三（しみずとうぞう，1893-1970）所作，因為監察院院長梁鴻志曾有〈重光大使屬題北極閣紀遊圖卷作者為同游清水董三君也〉、考試院院長江亢虎亦有〈為重光大使題清水董三畫金陵山水次爰居閣主人韻〉，⁷³如合汪作思之，

⁷¹ 周佛海日記另有「須防日本借參戰為名，實際上經顧問之手，以操縱中國之主權」，對比之下，從汪等對英美宣戰的戒慎所在，可以推論彼等參戰的目的，就在於收回主權與利權。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頁681-682、678。日本對汪參戰之意見，可參考（日）影佐偵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編譯：《汪精衛降日秘檔》（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頁62-63。

⁷² （日）重光葵著，齊福霖等譯：《日本侵華內幕（譯自《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の動亂》）》（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對華新政策」，頁326-333。

⁷³ 梁鴻志〈重光大使屬題北極閣紀遊圖卷作者為同游清水董三君也〉其一：「使星飛蓋暫尋春，畫手還攜澹淡人。寫出六朝山色好，華林馬射已成塵。北極閣一帶為南朝華林園故址」。其二：「北湖南埭接精蘭，烽罇清游客兩三。我自曠觀彌六合，所哀何止一江南」。江亢虎亦有〈為重光大使題清水董三畫金陵山水次爰居閣主人韻〉其一：「六朝而後又殘春，風物如逢隔世人。收拾江山歸畫裏，不教錦繡染征塵」。其二：「雲影天光一蔚藍，清游選勝趁春三。凌空更有培風翼，飛過江南向海南」。從梁、江二詩可以推想清水董三的畫風淡澹，梁、江藉此以諷兵燹過後的景象。周黎庵編：《古今月刊》第2期（1942年4月），頁5。

重光葵或計劃的找齊五院院長題詞，自錄其駐華一年四個月（1942年1月到1943年4月）期間的遊歷。但是梁、江題詩在春季，汪則於秋末矣。

汪氏所題「三潭印月」者，乃西湖十景之一，該處為西湖中最大島「小瀛洲」，島南湖水面上有三座石塔，初為宋代蘇軾所建，後迭有續修者。塔高二尺半，露出水面兩公尺，由基座、圓形塔身、寶蓋、六邊小亭、葫蘆頂組成，塔身球形中空，周身開有五個小圓孔，孔邊飾浮雕花紋。中秋時節在石塔的圓洞裏點上燈燭，把洞口糊上薄紙，水裏就會映出許多小月亮，這時天上月、水中月、塔中月與賞月人心中之月相互輝映，形成三潭印月的奇景。⁷⁴

汪精衛這首以水月相映輝照為主題的詩，不單切「三潭印月」的題畫主題，同時也運用了自身典故與創作慣習（habitus）。要理解汪於「三潭印月」中的「明月」本義，還需從《雙照樓詩詞稿》中「雙照」二字著手。⁷⁵

《雙照樓詩詞稿》所以名「雙照」者，出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⁷⁶由此觀之，自號雙照樓主人，不啻惓惓妻子，思之稍嫌軟弱多情，實則不然。蓋汪妻陳璧君（字冰如，

⁷⁴ 翔龍：〈三潭印月的傳說〉，《大紀元》，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1/9/25/n3383062.htm>，查詢日期：2017年6月7日。

⁷⁵ 詩詞中用「明月」、「雙照」，是汪獨有的慣習，一方面是他的親身經驗，一方面這些意象被反覆書寫，成為汪的圖式，反過來陶鑄（construct）他的行為與信念。布爾迪厄曾釋「慣習」云「習性（筆者案：即慣習）是歷史的產物，按照歷史產生的圖式，產生個人的和集體的、因而是歷史的實踐活動；它（慣習）確保既往經驗的有效存在，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為圖式的形式儲存於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範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性和他們歷時而不變的特性」。這是本文所以深考明月與雙照之用的社會學理論基礎，亦顏崑陽「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脈絡中。（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蔣梓驊譯：《實踐感》（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頁76-77。

⁷⁶ 汪曾有「野帳冰風冷鬢鬚，鄜州明月又何如？天涯我亦仳離者，莫話深愁且讀書」之詩，汪精衛：〈六年一月自法國度海至英國，復度北海，歷挪威、芬蘭至俄國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亞鐵道歸國。時歐戰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聲色。書一絕句寄冰如〉，《雙照樓詩詞稿》，頁60-61。

1891-1959) 非針線閨秀，乃同盟會元老級人物，更是汪的革命伴侶。1907年，十七歲的陳璧君為南洋富商之女，汪精衛隨孫中山至南洋募款，陳受汪精衛演講激勵與感召，先追隨汪至東京，參加同盟會，復與汪結成七人暗殺團，刺殺清廷攝政王。後謀洩，汪精衛、黃復生遭拘，此即「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之事。當時陳璧君不顧自身安危，多方奔走營救，在獄中的汪精衛感激其情意，借用顧貞觀〈金縷曲〉辭意，隱括勸陳出京避難之旨。

然而，最能透露出汪、陳二人當年精神的，卻是二十五年後的〈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汪女婿何孟恆於該詩題下逕曰「此詩作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應為三月，此版本有筆誤）卅一日。以此計算，則結婚當在民國前二年（1910）。《年譜》云於元年（1912）結婚，乃補行婚禮也。」⁷⁷考民國前二年（1910）三月十一日，時值舊曆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據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載，「埋藥由（黃）復生、（喻）雲紀任之，引放電機則先生自任之（由汪精衛負責引爆炸彈）。二月二十一日夜午（1910.3.31），復生、雲紀同往橋下掘孔，因犬聲四起，未能竣事；次夜（1910.4.1）復往……

⁷⁷ 從《雙照樓詩詞稿》所列此詩的前後諸作，亦考知為1935年所作，則其結婚之年（或者說私定終身之年），當在庚戌（1910）矣。上坂曾引用其採訪何孟恆時所攝書畫（為一扇面），主張兩人結婚於1909年3月31日。但何孟恆在1999年的《雙照樓詩詞稿讀後記》直指汪陳結婚於1910年5月31日。筆者承「汪精衛紀念託管會」之幫助，獲睹汪精衛於1939年2月26日以後所書〈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長軸，詩後跋文云「二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十五年紀念結婚賦此詩示冰如，而是日又為孟恆與仲蘊訂婚之期。越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結婚，因錄此詩，以貽二人。精衛。」扇面與長軸皆作三月而非五月，可知結婚於三月；何女士又解釋道，其父何孟恆《雙照樓詩詞稿讀後記》手稿屢易，柏克萊圖書館所典藏者，當屬一時筆誤。除了月份之誤，年份上的差異在於：何孟恆用虛歲方式算結婚紀念之年，上坂冬子是用算實歲的方式算。一般而言，結婚的當年，即為結婚第一年，隔年，則為結婚第二年，上坂的推算不合情理。應以何說年份為是。《雙照樓詩詞稿》，頁230、240-241。何孟恆：《雙照樓詩詞稿讀後記》，頁4。（日）上坂冬子：《我々は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東京：講談社，1999年），頁114-115。汪精衛書：〈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紐約：汪精衛紀念託管會典藏）。

電線過短，不敷使用；第三日（1910.4.2）……晚間十二點之後，續行敷設。忽見橋上有人窺伺……此一說也。又謂先生偕雲紀來橋下埋彈，旋雲紀出都，則先生遂一人獨往。二月二十三夜（1910.4.2），先生懷彈至銀錠橋……翌日拂曉，尚未迄功……謀遂被洩」，⁷⁸張編還廣羅中外報紙，互為考訂。雖然日期間有出入，但是無論以何日為是，埋彈之事，最早始於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3.31）；至於事洩，至遲於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三夜（1910.4.2）已遭人舉報。之後的兩周期間，清廷沒有打草驚蛇，而是逐漸佈線、蒐集證據，甚至讓陳璧君等人赴日補購火藥，最後汪精衛與黃復生於宣統二年三月七日（1910.4.16）被捕。

汪陳既結婚於1910年3月31日，由此可知，兩人幾乎是在埋彈行動的前一刻，互訂終身。得此，再看〈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並。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復信來生。

頭顱似舊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

汪等七人暗殺小組的目標在於振奮人心、團結黨人，用破清廷立憲之局。⁷⁹無論事成事敗，只有宣傳意味，而無攻城掠地之效，徒為犧牲；此孫文、黃興、胡漢民所以力阻之故。汪、陳在決定執行暗殺行動之前，私定終身，想來並非願望長相廝守，而是互許以身殉國。所以，汪在「結婚紀念日」，不稍作兒女態，卻逕為賭生誓死這種超乎常情，甚至「頭顱似舊元非望」稍嫌不祥的比喻，遂可以理解，因為這是兩人最是情濃、同心，為革命志業行險以犧牲的共同記憶。這是專屬於汪氏夫妻二人的隱喻。

首聯「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並」之「依然良月」者，就是當時汪精衛與陳璧君互訂終身後、旋即分頭行事，於午夜埋設炸藥、為革命行險犧

⁷⁸ 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北京：綫裝書局，2003年《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影印1943年《拜袁堂叢書》本），頁5b-6a。

⁷⁹ 許育銘：〈汪兆銘革命生涯的崛起〉，《東華人文學報》第3期（2001年7月），頁323-346。劉威志：〈汪精衛行刺滿清攝政王之心態及其獄中詩詞初探〉，《有鳳初鳴年刊》第4期（2009年9月），頁263-276。

牲之心情。「志決但期能共死」則因當時汪懷引刀一快之念，而陳抱不獨活之志也。「情深聊復信來生」之句，據傳陳璧君於汪精衛病重之際，曾失態地問日本醫生是否有來世云云，⁸⁰想來這是汪氏夫妻間長久以來的絮語。顯然，理念上汪並不認同「靈魂」之說，只是妻子情深，念茲在茲，者般在乎，故而體貼其意，遂云「聊復」。這組對句中，透露出兩人的核心理念與日常相處。腹尾二聯「頭顱似舊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見汪氏夫婦之相知相惜，非如一般情長兒女。⁸¹

陳璧君，字冰如（陳字為汪所取）。璧君、冰如二字，在古典的象徵體系中，殆可指月，而汪詩涉及月亮或中秋，多與陳璧君相關；⁸²也因為陳璧君所代表的，不只是情人，也是革命的同志，所以汪詩中涉及明月中秋的意象，也與汪精衛的革命志向、救國理想、自我人格修養，息息相關。如〈癸未中秋作示冰如〉，⁸³該詩末尾云「（明月）屹然照此白髮翁，鐵骨冰心不相忤。芙蓉花影今宵多，依然壁上蔓藤蘿」，以月自證「鐵骨冰心」。引明月為摯友誼友、為模範榜樣、為護持之對象，汪詩中從不少見，如「明月有大度，於物無不容。妍醜雖萬殊，納之清光中。江山既輝媚，塵土亦清空」，⁸⁴又如「海波如搖籃，皓月如睡兒。……殷勤與將護，勿遣朝寒欺」，⁸⁵再如「明明天邊月，

⁸⁰ 汪臨終前，陳璧君悲痛難當，失態詢問醫師黑川利雄：「肉體毀滅之後，靈魂還會在世上存在嗎？」，黑川慰以佛語「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此為日本東北大學醫學教授黑川利雄（くろかわとしお，1897-1988）的回憶。他是日本癌症醫學的權威，也是發現汪患多發性腫瘤的醫師。（日）関岡涉：《汪兆銘遺書の謎》（名古屋：メディアアーカイブ，1999年12月），頁230。

⁸¹ 陳璧君珍重此詩久矣，從現存文物中，可見和平運動時期，汪精衛多次將詩鎮重書諸扇面，贈予陳璧君。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編：〈文物目錄〉（內部目錄，未公開）。

⁸² 〈二十五年一月病少間，展雙照樓圖，因作此詩以示冰如〉、〈秋夜〉、〈水調歌頭辛巳中秋寄冰如〉，《雙照樓詩詞稿》，頁250-252、319。

⁸³ 同前註，頁340-341。

⁸⁴ 汪精衛：〈壬午中秋夜作〉，同前註，頁327。

⁸⁵ 汪精衛：〈方君璧妹自北戴河海濱書來，云海波盪月，狀如搖籃。引伸其語，作為此詩〉，同前註，頁326。

蕩蕩海上波。白雲與之潔，清風與之和。有如赤子心，萬事相涅磨。憂患雖已深，坦白仍靡它」，⁸⁶皆致意於明月。楊治宜認為明月在汪詩中，常作為跳脫人世紛紜與國族分別的超越性存在，⁸⁷但我們更不能忽略的是明月中，陳璧君的身影。

得此，可知杜甫「雙照淚痕乾」之相思句，在汪氏夫妻之間，卻另有一股革命情侶救國為民、同生共死一段動力在。汪精衛指月思妻，重誓兩人共同為國犧牲的志意。這是汪之詩詞裏，何以指明月而自清，挾明月以自礪，冀明月為我行事與心事之印可，證我「心跡雙照」的潛在動因。

依此「雙照」的今典來由，思索《雙照樓詩詞稿》的命名，可以說明月是汪精衛對愛侶專情、對革命初衷的明志，並藉此自省自礪的象徵。換言之，《雙照樓詩詞稿》所呈獻之對象與預設讀者，就在「雙照」二字當中。或許可以說，汪在詩詞中所創造出的明月、陳璧君、妻子、同志、革命救國之志業、處世的自我修養，已形成一組意義結構，陶鑄著汪的行為與意向。

既理解淞滬停戰協議時，汪精衛與重光葵的努力，並爬梳「雙照」云何之後，則汪精衛贈重光葵以月詩，且以三潭印月等如許多月為題，當是傾其所有，欲與斯人心心相印，足見汪氏對重光葵的開誠、冀望與信任。〈重光大使屬題三潭印月圖卷〉詩云：

水色澹而空，月光皎以潔。水月忽相遇，天地共澄澈。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空靈極動盪，涵泳歸靜寂。我心亦如水，印月了無跡。願持澹泊姿，共勵貞明節。

這首五古扣題而作，不施典故，簡潔明白，或有意讓日人重光葵易讀易懂。但以月證己心，乃移用自己《雙照樓詩詞稿》中最關鍵的「雙照」之義，且巧妙

⁸⁶ 汪精衛：〈海上〉，同前註，頁 135-136。

⁸⁷ Zhiyi Yang, "The Road to Lyric Martyrdom: Reading the Poetry of Wang Zhaoming (1883-1944)," (通往抒情的犧牲：汪兆銘的詩)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 Articles, Reviews*, 37(2015), p. 153.

的呼應與融化了禪宗水月之喻，與宋明理學「理一分殊」的觀念。⁸⁸

詩起前四韻，全圍繞「三潭印月」作描寫，其中「澹而空」、「皎以潔」，各為水、月兩主體的特質。當兩個主體相遇之際，先迸發「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般互為涵泳體用的現象，再而「空靈極動盪，涵泳歸靜寂」之能動能靜、發與未發之間，表面上寫水、月交映之姿態變化，而伏筆卻是陽明心學之學問基底與應用。

汪精衛素喜陽明學，⁸⁹ 旅日時曾意譯里見常次郎《陽明與禪》並以茲為十九歲的陳璧君講解。⁹⁰ 後陳璧君辛苦保護汪氏此份口譯稿，⁹¹ 最終得在汪政權外交部部長褚民誼的主持下刊行，而且，褚民誼還在此份譯本後，另出一書，名《書陽明與禪後》，乃褚氏讀後感及注解。但與本詩最直接相關的，乃是出版《陽明與禪》譯書的費用為重光葵所贊助，並曾題文〈書精衛先生所譯陽明與禪後〉：⁹²

⁸⁸ 玄覺《永嘉證道歌》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朱子語錄》云「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分見唐·釋玄覺撰，元·釋永盛注頌：《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2011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據明正統三年〔1438〕重刊元後至元三年〔1337〕刊本影印），頁29b-30a。南宋·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晦庵朱先生朱文公語類卷十八，頁425-426。

⁸⁹ 汪精衛〈陽明與禪跋〉（1938年2月28日）云：「余十三四歲時，晨入塾從塾師習舉業，日將晡，自塾歸家，取父所藏書，手一二冊，升屋瓦踞坐，就夕陽光中讀之，至曛墨始已，所讀之書較之舉業，遙為有味。王陽明《傳習錄》其最愛讀者也。二十歲後留學日本，在神田書肆得王陽明雜誌百餘冊，其他研究王學之書亦最夥」，（日）里見常次郎著，汪精衛譯：《陽明與禪》（南京：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1942年刊本），跋文無頁碼。

⁹⁰ 汪精衛〈陽明與禪跋〉：「己酉（1909）之冬，復至東京與冰如數數論及陽明學，……且讀且譯，以授冰如。」同前註。

⁹¹ 汪精衛：〈陽明與禪跋〉，同前註。

⁹² 褚民誼〈書陽明與禪後·小引〉：「適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先生，既首然樂助本書刊印之貲，復沛然成書後一文，別誌本書。鴻雪文簡而勁，委委包舉。謙謙君子，侃侃大人，予文章草草，媿不及焉」，褚民誼等著：《書陽明與禪後》（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1942年刊本），頁1b。

精衛先生挺秀異之才，盡磨礪之功，妙年超海遠遊我邦，績學紡文，鳳毛五彩，無幾，劃革命之宏業，熱腔如火，炯眼如日，揮子房之椎，視死如歸。風雲變化，天地震動，何其壯烈乎，逮于運入陽九，忘身憂國，含垢愍眾，能保九州之金甌，復鑄萬里之鐵城，日月重華，山河更新，何其勤劬乎。當此之時，斯書告成，竊謂陽明王子之學，以致良知為歸；達摩禪宗之旨，以一死生為要，惟先生之所為，適與此二者相符，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顧茫茫禹域，古道殆湮，國基尚淺，人各有私，不知自反，轉益多故。先生之神識，稽禍因，溯病源，豈容袖手旁觀。此書之所以成，蓋非偶然也。余輩雖驚，庶幾克己奮勵以從事東方之時務矣哉。

昭和十七年（1942） 月 向陽學人重光葵謹識

讀此可知，汪精衛詩中「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水月互涉的禪家本旨與「空靈極動盪，涵泳歸靜寂」的陽明體用思想，是重光葵所熟悉的。故汪詩末兩韻「我心亦如水，印月了無跡。願持澹泊姿，共勵貞明節」，寫回自己之心情與願望，願以「澹泊姿」而勵「貞明節」，持贈重光葵。

考汪此時的政治理念，以中日真誠相交，以對抗歐美殖民為主。斯時也，詠和日本、呼應東亞共榮理念諸詩，若非諛媚失骨、自降身價；⁹³就是以口號標語為詩，淪為打油、竹枝之流。⁹⁴梁鴻志用典設意較精巧，作成一遍和煦氛圍，但深究典故，知其「秦晉終修好」、「荆凡貴並存」之意，仍在寰宇諸國的相互算計之中，屬於外交場合的辭令，非真心誠意與日「和平」。

汪精衛則否，明月之喻，既融攝陽明學與禪宗，也呼應現實的與政治的風景（三潭印月與汪日合作），並蓋喻自己與重光葵之交為水月之交，進而期望

⁹³ 譬如王揖唐《東遊草》之作與當時臺灣詩人之作，相關論述，參張明權：《同文論述下的臺灣漢詩壇：1931-1945》（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廖振富先生指導，2008年）。

⁹⁴ 可參汪政權諸人唱和汪精衛〈滿江紅〉、〈金縷曲〉之作。陳道量編：《國藝月刊》第2卷5、6期合刊（1940年12月），頁41-44。

中日兩國能真誠互信。本詩光風霽月，豁然大度；當時日人，持「東亞共榮」之說者多矣，但多偏狹激進、傲慢意得，未能有汪精衛如此氣象與胸襟者，譬如「願持澹泊姿，共勵貞明節」就比梁鴻志「我懷石關口難言」更具氣象與風骨。以國府主席而贈日大使此詩，符合其領導者的身分。

五、結 論

至今為止，為汪政權翻案者，大多圍繞蔣親英美、毛親蘇聯，何異於汪之親日？這樣的論述邏輯，是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的縱橫家謀略所致。從梁鴻志在本文所舉復國之際、面對國人、對日交涉三種情境的詩作文本中，如「齊人初返汶陽田」、「汝曹以國為孤注」、「須信荆凡貴並存」諸句，都很可以發現縱橫家邏輯或情結。

但是，這卻不是同為敵偽政權領導者汪精衛在詩詞中的表現方式。汪的詩詞中表現出絕大的悲感、犧牲、承擔與誠意。準此，可以推論當時後世以「縱橫家」謀略詮釋汪政權的進路，如「蔣汪雙簧說」、如對汪氏遺書《最後之心情》的解讀，至少在汪精衛直抒情志、表現「詩用」的詩詞裏，是不存在或者不被視為創作之際的第一義的。退一步說，以縱橫家之角度論汪精衛，很可能與梁鴻志共擁相同的「歷史心性」。

汪精衛通敵時的思考與心情，似乎別是一家。

對比汪、梁兩首對日交涉交往詩作，梁鴻志巧用典故，抒發受國人之壓力，表面表示對日之建議，典故底下仍稍藏微辭，較諸汪，梁仍執著於形勢優劣，言外之意雖妙，境界卻遜一籌。汪精衛則一以自身「雙照」的生命史與自我期許出發，以水月喻兩國之交，文字雖平實，內涵與胸襟卻極高闊。汪精衛以誠待敵，復不對暗殺自己的刺客有所反擊。汪潛在的預設似乎是把大家無分你我地，都劃歸到與自己同心同德的理想境界。

但如果說，汪精衛的通敵，是單純與天真的理想，則又難以解釋汪詩詞中「艱難留得餘生在，纔識餘生更苦」、「夜深案牘明燈火，擱筆淒然我」的這

些洞燭一切的悲感，與「誓窮心力迴天地，未覺道途修阻」、「挽作天河一洗為神州」的擔荷姿態。更可以說，汪就是確切認知到這些，所以「還都」之際，他不羅列致仕拜相的典故（梁鴻志），也不驕矜自喜（周佛海），⁹⁵反而不自覺流露李後主的亡國隱喻。

葉嘉瑩以「弱德」釋汪詞，擺落一切，直指本心；⁹⁶本文以梁、汪對比，從梁鴻志詩「文本與情境」的對照關係、移動觀察裏，迂迴得證。或許，該承認汪精衛有一種道德政治的理念，並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戰時的通敵問題，與通敵下的詩詞美學與詩詞倫理學。

伯夷叔齊有「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自省，尼采亦謂「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戰後，無論是侵略者或抵抗者，「怪物」的歷史心性，也移形換影，附胎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裏。

於是，不讓自己成為怪物的汪精衛，遂在我們的認知中，成為「歷史的怪胎」。⁹⁷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

⁹⁵ 余英時：〈雙照樓詩詞稿序〉，《雙照樓詩詞稿》，頁22-25。

⁹⁶ 弱德之美，可參葉嘉瑩：〈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反思與世變之關係〉，《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93-217。葉嘉瑩：〈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的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頁110-126。

⁹⁷ 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偽國民政府始末》（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釋玄覺撰，元·釋永盛注頌：《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2011年，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據明正統三年（1438）重刊元後至元三年（1337）刊本影印。
-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四部分類叢書集成影印殷禮在斯堂叢書本。
-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百部叢書集成本影印武英殿聚珍版。
- 宋·任淵等注：《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宋·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5年。
- 方君璧繪、汪精衛等題詞：《秋庭晨課圖卷》，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民國二十三年（1934）刊本。
-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於本院平沼議長ト会见セラレタリ・梁院長一行人名表並日本滞在〉（昭和13年11月17日），《樞密院文書・宮内省往復・稟議・雜書・昭和十三年》，国立公文書館藏，ア

- 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 《申報》（上海版），1872年4月30日創刊至1949年5月27日，共26845號，檢自「愛如生全文檢索版《申報》資料庫」。
- 《申報》（香港版），1938年3月1日發刊至1939年7月10日停刊，共489號，檢自「愛如生全文檢索版《申報》資料庫」。
- 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7年秋季拍賣會「汪兆銘《雙照樓詩詞稿》底稿四頁」，<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119202026/>。
- 余子道等：《汪偽政權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李宣倜：〈虞美人和雙照樓〉，陳道量主編：《國藝月刊》2卷2期（1940年8月）。
- * 何孟恆著：《雙照樓詩詞稿讀後記》，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藏鋼筆影印本，1999年。
- 汪辟疆撰，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汪夢川：〈汪精衛與南社「代表人物」說〉，《江漢論壇》2006年第4期。
- 汪榮祖：《詩情史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汪精衛等：《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傳部，1941年。
- *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年。
- 汪精衛著，龍榆生校補：《雙照樓詩詞稿》，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藏1945年陳璧君獄中手抄呈贈端木愷本，1983年影印本。
- 汪精衛：〈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紐約：汪精衛紀念託管會典藏。
- 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編：〈文物目錄〉，內部目錄，未公開。
-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 周軍：〈不該遺忘的「金陵毒酒案」〉，《文史精華》2008年第11期。
- 周黎庵編：《古今月刊》第二期（1942年4月）。

-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
- 冒效魯：《叔子詩稿》，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
- 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風月俱樂部編：《風月報》共132期（1935年5月至1941年6月），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據原版影印。
- 《南京旅遊地圖》，南京：南京圖書館藏1939年刊本。
- 高丹宇：〈日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始末〉，《東南文化》1999年第2期。
- 徐俊：〈附逆之外的梁鴻志——爰居閣譚屑〉，《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24日。
-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北京圖書館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拜袁堂叢書》本。
- 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北京：綫裝書局，2003年《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影印1943年《拜袁堂叢書》本。
- 張明權：《同文論述下的臺灣漢詩壇：1931-1945》，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廖振富先生指導，2008年。
- 梁鴻志：《爰居閣詩》，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1938年刊本。
- * 梁鴻志：《爰居閣詩續》，南京：南京圖書館館藏民國1941年刊本。
- * 梁鴻志著，陳世鎔注：《爰居閣詩註》，上海：上海圖書館藏1945年十一卷刊本。
-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臺北：國史館，1999年。
- 許育銘：〈汪兆銘革命生涯的崛起〉，《東華人文學報》第3期（2001年7月）。DOI:10.6420/DHJHS.200107.0323
- 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收於陳公博著，汪瑞炯等編註《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年。
- 陳道量主編：《國藝》共3卷25期（1940年1月至1942年4月），檢自上海：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民國時期期刊全文資料庫

(1911-1949)》。

陳鵬仁譯著：《汪精衛降日秘檔》，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黃美真、張云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翔龍：〈三潭印月的傳說〉，《大紀元》，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1/9/25/n3383062.htm>，查詢日期：2017年6月7日。

* 葉嘉瑩：〈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的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印刻文學生活》第9卷第2期（2012年10月）。

葉嘉瑩：《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編：《維新政府初周紀念冊》，南京：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1939年。

維新政府概史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概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1940年南京特別市行政院宣傳局排印本。

* 褚民誼等著：《書陽明與禪後》，南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1942年刊本。

趙尊嶽：《珍重閣詞》，新加坡：周國燦、周文全、高芝榮自印本，1981年。

* 趙尊嶽：《高梧軒詩》，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名家手稿」鋼筆手稿九卷本。

趙尊嶽：《高梧軒詩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十三卷刊本。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劉威志：〈汪精衛行刺滿清攝政王之心態及其獄中詩詞初探〉，《有鳳初鳴年刊》第4期（2009年9月）。DOI:10.29458/AGSCLSU.200909.0017

劉威志：《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1938-194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祝平次、王偉勇先生指導，2017年。

- 劉 靈：〈論偽維新政府統治環境的脆弱——基於「維新政府殉難先烈題名錄」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
- 蔡德金、王升編：《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
- 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偽國民政府始末》，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
- * 顏崑陽：《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6年。
- 顏崑陽：《詩比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17年。
- 顏崑陽：〈中國古代「詩用」語境中的「多重性讀者」〉，政治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合辦「文學閱讀的觀念與方法：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2017年6月10-11日。
- (日)上坂冬子：《私は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東京：講談社，1999年。
- (日)戶部良一著，韋平和等譯：《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
- * (日)里見常次郎著，汪精衛譯：《陽明與禪》，南京：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1942年刊本。
- (日)重光葵著，齊福霖等譯：《日本侵華內幕（譯自《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の動乱》）》，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 (日)關岡涉：《汪兆銘遺書の謎》，名古屋：メディアアーカイブ，1999年。
- (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蔣梓驊譯：《實踐感》，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 Zhiyi Yang, "The Road to Lyric Martyrdom: Reading the Poetry of Wang Zhaoming (1883-1944),"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 Articles, Reviews* 37(2015), pp. 135-164.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u, M.-Y., et al. (1942). *Shu Yang-Ming yu Chan hou* [After writing about Wang Yang-Ming and Zen]. Nanjing: Sino-Jap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 He, M.-H. (1999). *Shuangzhaolou shici gau du hou ji* [A record after reading the *Poem manuscripts of Double-Illuminating Chamber*]. [Photocopy of a fountain-pen manuscript]. UC Berkeley Library, California.
- Liang, H.-Zh. (1941). *Yuanjuge shi xu* [A sequel to *The poems of Yuanju Pavilion*]. Nanjing Library, Nanjing.
- Liang, H.-Zh. (1945). *Yuanjuge shi zhu* [*The poems of Yuanju Pavilion* with annotations] (Chen Sh.-R., Annot.).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 Satomi, T. (1942). *Yang-Ming yu Chan* [Wang Yang-Ming and Zen] (Wang J.-W., Trans.). Nanjing: Sino-Jap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 Wang, J.-W. (2012). *Shuangzhaolou shici gau* [Poem manuscripts of Double-Illuminating Chamber] (Wang, M.-Ch., Annot.). Hong Kong: Cosmos Books.
- Wang, M.-K. (2015). *Fansi shixue yu shixue fansi: Wenben yu biao zheng fenxi* [Reflectiv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 A textual and symbolic analysis]. Taipei: Asian Culture.
- Yeh, Ch.-Y. (2012). Shuo Wang Jing-Wei wannian cizuo zhong de ganqing xintai, jian lun citi zhi megan tezhi: Cong Wang Jing-Wei yi shou “Yi jiuyou” ci tan qi [On Wang Jing-Wei’s emotions and mentality in the *ci* poems of his later years, also on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the *ci* type: Started with one of Wang Jing-Wei’s *ci* poem “Missing my old friends”]. *INK Literary Monthly*, 9(2), 110-126.
- Yen, K.-Y. (2016). *Fansi pipan yu zhuanxiang: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zhi*

lu [Reflection, criticism, and reorientation: The road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Taipei: Asian Culture.

Zhao, Z.-Y. [ca. 1958]. *Gaowuxuan shi* [Poems of Tall- Chinese-Parasol-Tree Pavilion]. [9-volume fountain-pen manuscript]. Master Manuscript.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